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歷史：30周年紀念介紹

彼得·塔夫（Peter Taaffe）著

一個社會主義 世界是可能的



定價 HKD35 NTD135 RMB25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歷史：30周年紀念介紹

目錄

| | |
|---------------------------|----|
| 序言 | 3 |
| 格林斯潘宣告「市場經濟」的勝利 | 3 |
| 人口的大遷移 | 4 |
| 全球性反抗的第一階段 | 5 |
| 「國際」 | 6 |
| 蘇格蘭社會主義黨 | 7 |
| 對馬克思主義立場的背棄 | 7 |
| 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USFI） | 8 |
| 托洛茨基和革命的政黨 | 9 |
| 不斷革命 | 10 |
| 中國、南斯拉夫和古巴 | 11 |
| 在法國失去的機會 | 12 |
| 今天的革命政黨 | 12 |
| 國際社會主義趨勢／社會主義工人黨（IST/SWP） | 14 |
| 過渡綱領 | 15 |
| 社會主義工人黨（SWP）的選票至上主義 | 15 |
| 馬克思主義者在廣泛組織中的工作 | 17 |
| 民主和政黨 | 17 |
| 社會主義工人黨（SWP）的改良主義 | 19 |
| 「莫雷諾主義」傾向 | 20 |
| 國際政黨還是「郵箱」？ | 20 |
| 巴西的階級調和主義 | 22 |
| 即將發生的革命事件 | 22 |
| 參考書目和出處 | 23 |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歷史：30周年紀念介紹

*工人國際委員會國際書記處（IS）2004年發佈

序言

2004年4月是工人國際委員會（工國委）成立30周年。工國委的國際書記處決定再版1997年的小冊子《工國委的歷史》修訂版以慶祝工國委過去30年來在國際範圍內為工人運動的所做的各種活動和貢獻。客觀上，從那時候國際工人運動中充滿了各種重要的發展和意外事件。工國委的角色和影響在某些地區和國家內得到了戲劇化的發展，同時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我們看見反對資本主義運動的興起，以及數以百萬計的群眾組織大規模反對布殊和貝理雅發動伊拉克戰爭的運動。與之相伴的是工人階級激烈的鬥爭；尤其是在歐洲，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反對資本家採取新自由主義政策損害他們的權利和生活條件；由此在歐洲大陸上引發了一系列的罷工，其中包括一些持續一天的地區總罷工或者公共行業罷工。

考慮到這一情況，工國委國際書記處感到有必要提供工國委對以上事件的最新觀點，既是針對這些事件的發展，也包括區別我們工國委的角色和其他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的行為和觀點上的差異。因此，這必然涉及到對於其它組織的政策和綱領的分析，以及將它們與工國委之間進行比較。這一對比的方式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分析方法，起始於馬克思，同時也受到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影響，也就是他們如何對待那些不符合工人階級和勞工運動的需求的思想、趨勢和組織。

不得不承認這種分析方式會引起爭論而且在「後現代主義」時期被認為顯得有些過期。尤其是在20世紀90年代，「爭論」該詞似乎應被換為更禮貌的用語「交流」，這已經成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意識形態專家們和他們的信眾——前社會民主黨人和前共產黨領導人們的共識。資本主義的優越性和「市場」的最終勝利已為他們自動接受，他們間所有的相關討論都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

但是事實上，隨著政治形勢的日益尖銳，尤其是在新世紀的最初幾年導致了比上世紀90年代更為緊張的政治衝突。例如隨著伊拉克戰爭的發展，使得統治集團分化成為以美英為首的一邊和以德法為首的另一邊。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工人階級對於右翼的勞工運動和工會領導人的背叛而深感惱怒，這導致了工人階級憤怒地要求為勞工運動提供一支新的具有領導力的先鋒力量和對於前進方向提供清晰的階級分析。由此我們可以理解具體什麼樣式的方式和組織是工人階級在這個時代所需要的，而且這是與當前政治形勢的特徵直接相關聯的。接下來，就是涉及到理解最近的歷史情況及其如何變化，其中一些具有尖銳特徵的情況已經發生或者在下一個階段即將發生。

1990年代的政治形勢被證明對於工國委和其他仍然堅持左派立場的組織，尤其是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的組織而言是非常困難的。史達林主義的崩潰導致一個與以前數代人在20世紀所面臨的截然不同的時代，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是近50年來最困難的時期。沒有其他所謂的托洛茨基主義的國際組織象工國委那樣能迅速地和清晰地理解柏林牆倒塌後所帶來的主要政治特徵。隨著柏林牆倒下的不僅是史達林主義，也包括東歐的計劃經濟和蘇聯。

與現實相反，正如我們將在分析中所看到的對於不同組織的立場的分析，有些組織和個人的行為就象政治駝鳥一樣不願意承認現實。他們將他們的腦袋埋在沙裡，直到很久以後才承認這些事件意味著工人運動國際性的失敗。一些人將它視為暫時性的挫折而不是決定性的失敗。另一些將這視為歷史性的大災難，假如不是將這視為永遠的失敗的話，也認為社會主義和對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展望在未來的數十年內將不再在需要考慮的備忘錄上。工國委認為史達林主義的崩潰是一場失敗，而且是嚴重的失敗；但它還沒有達到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法西斯主義政權在德國、義大利和西班牙獲取的勝利而帶來慘重失敗的那種程度。那次慘敗造成了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和它不計其數的犧牲。

史達林主義的失敗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提供了可能性以證明「社會主義」已經遭受到了「歷史性的失敗」（它們錯誤地將「史達林主義」等同於「社會主義」）。由此這給它們提供了機會以進行兇猛的政治攻勢來反對社會主義。同時他們在數以千計的不同平臺上堅稱只有「市場」才能為人類提供永久性的運行機制。這被佛郎西斯·福山進行哲學性的斷言為「歷史已經終結」。由此他意味著自由的資本主義民主體制將無法再進一步改進了，這一體系（資本主義體系）將成為社會所可能接受和願意接受的唯一組織形式。

格林斯潘宣告「市場經濟」的勝利

《華爾街日報》作為大企業的走狗並代表整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恬不知恥地宣稱：「我們贏了！」。甚至最近，美帝國主義發言人自誇他們制度的優良也同出一轍，即使他們當下面臨著可能比1989年更麻煩和更困難的世界，他們仍然在尋求保障他們自己和他們階級的安全與利益。

阿蘭·格林斯潘——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前主席和美國資本主義體系的經濟大師——最近在柏林宣佈：「我曾經多年參與的二十世紀以來最為重要的，關於最佳經濟組織結構的根本性的論戰。而這已在十年多前柏林圍牆拆除的時候，被決定性地解決了。如同蘇聯一樣，整個蘇聯東歐集團的經濟體系在二戰前與西歐的市場經濟體系在很多方面是類似的。在

戰後歐洲的最初四十年，兩種不同類型經濟的在有限地相互作用情況下並肩發展，這正如實現了針對不同經濟制度的生存能力進行可控制的實驗一般。

「作為清楚明白的結果，通過柏林牆的拆除充分表明了對市場經濟的支持。這結果的影響是如此深遠和廣大的。我們可以確信關於自由市場經濟和中央計劃經濟的長期爭論已經終結了。的確，仍然有一些人支持舊的社會主義。但對相當多的以前的信奉者現在只不過是傾向於高度弱化的社會主義，是社會公正和市場效率相混合的產物，經常被稱為市場社會主義。嚴格的中央計劃經濟被捨棄了，它總的來說被認為是不合格的和產生負面影響的。不再有針對計劃經濟的讚美，它們都被停止提及了；相當多的發展中國家都從社會主義轉向了更多為市場導向的經濟制度。」¹

然而，面對日益迫近的世界經濟的崩潰和由入侵與佔領伊拉克所引起的災難性的大混亂，格林斯潘那些評價無非是在黑暗中吹口哨以鼓舞他所代表的那個階級。他的評論是屬於1990年代的早先時候。在1990年代的某一個階段，社會主義的政治覺悟——尤其是在工人階級內的廣泛理解——毫無疑問地被拋棄了。雖然意識被削弱了，但工人階級的基本潛在的力量仍然存在而未損傷。階級力量的對比關係並不象在1930年代時候一樣有利於統治階級。

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毫無疑問地在支持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上有實質性的效果，從而削弱了工人階級的權利和條件。然而，在硬幣的另一邊是與「自由資本運動」相關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已經降低了國家間的障礙。這導致資源從一個國家和一個大陸迅速移動到另外一個國家和大陸。所有的這些迫使工人階級從一個大陸甚至世界的範圍內考慮問題。換句話說，資本主義為一個未來的新國際主義準備了客觀基礎，作為第一個可資證明的案例，即在1990年代後半期和本世紀初的早些時候所進行的強有力的「反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

從倫敦到西雅圖，從布拉格到發生在熱那亞和哥德堡的歷史性的血腥的衝突，在尼斯、魁北克、派特阿傑、巴黎、孟買，毫無人性的「現代」資本主義體系和對殘暴的全球化盲目崇拜已經被唾棄了。直接看來，青年人對未來的期望以及他們行動上的轉變已經表明了這一點，而且在一些方面也被工人中的重要階層所支持。進一步看，這種新的國際主義被打上大陸和全球範圍「人民」鬥爭的標籤，但是階級分歧最終會在一個階段暴露出來。卡爾·馬克思是在他那個時代中第一個認識「全球化」的先驅者，隨著世界市場的發展，與它相關的世界工人階級也產生了「世界歷史」：「無產階級…只可能在世界範圍內歷史性的存在，正如共產主義和它的運動也只有能在世界範圍內歷史性的存在。」²他進一步說明：「隨著市場延伸成為一個世界市場，使得世界範圍內的運動變得可能，而且日益成為事實，從而推動向一個新階段的歷史發展。」³

相比今天，當時世界勞工分工的發展導致的世界性的相互依賴尚處於「幼年期」，而且很大程度上不為當時的大多數人

所認識。

人口的大遷移

今天的情況有何不同呢？通過互聯網、衛星電視、24小時新聞和海外旅行等等，世界被聯結在一起，並成為可以被多數世界人口所能感知和認識的真實世界！電視和行動電話在地球上一些經濟上最不發達最貧困的地區都變得越來越普及。

這是馬克思的「混合和不均衡發展」的規律的反映，最新的科技與技術伴隨著封建和半封建的社會關係上。技術被應用到了眾多經濟不發達地區，即使這些地區還沒有完成「資產階級民族和民主革命」。這些革命包含徹底的土地改革，國家的統一和在現代意義上社會的發展，這一革命早在數百年前的歐洲就被資產階級完成了。但是在大部分的亞洲，非洲甚至拉丁美洲，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只能由工人階級掌握權力然後動員他們身後廣大的農村人口，然後建立工人政權——一個工人和農民聯合的政府來完成。這將引導在國家，大陸和世界的範圍內推行社會主義措施。這就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本質。這些貧窮國家長期被資本主義控制下延續着封建，半封建和陳腐的社會和落後的經濟關係，這一理論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其有效性。

人們絕不可能漠然置之而默許社會的停滯和墮落。通信科技擴展到世界各範圍，意味著當絕大多數人還在貧困之中遭受折磨之時，少數一些人更好的生活狀況將展現在大眾的面前。它為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人口中最富有活力的部分人群或者說那些擁有足夠資源的人群提供了具有吸引力的「磁石」，使他們尋求途徑前往可獲取更好的商品和更高的生活水準的歐洲，日本和美國等地。因此造成了大規模的人口移動，人們藉由任何可能的機會從貧困缺乏的區域逃離，或者由於戰爭和迫害所驅使而被迫離開家園。

資本家對這一現象的反應是偽善和矛盾的。他們被迫仰賴移民來填補低工資的血汗工作，並試圖彌補技術差距。通過較年輕的移民的流入，他們也可以此來彌補人口老化的情況。同時，資本家還以移民作為替罪羔羊來遮掩他們制度上的痼疾。提出「歐洲堡壘」的概念也是嘗試著超越歐洲的極右派的主張，因他們已經威脅了一些主流資本主義政黨的選舉地位。

然而，當移民打開了進入先進工業社會的大門的時候，一個逆向過程也正在發生——一個大規模的工作「重置」，大量的製造行業和最近產生的「服務」行業職業正在轉移到中國、印度和其他「不發達」地區。這現在也包括東歐諸國，就算不算上俄國。這一情況尖銳地引起了民族國家範圍內的工人表達自己綱領的需求，特別是工會們需要保護國內工人們的工作以及捍衛移民工人組織工會的權利來反對這種有害的「外包」工作。這不過是資本家「利潤最大化」這種根深蒂固驅動力的最新表現而已。他們所列舉的理由，在一部份情況中也正是如此，以製造業中數以百萬計相對高收入工作

的喪失為代價，而由臨時性的較低工資的所謂「服務」行業所替代！我們以在「現代化的」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工人的命運為例；三分之一的西班牙勞動力處於臨時合同的雇傭中，而且合同之間平均有十天的空餘！

這導致的結果是工人階級中相當重要的部分陷入貧窮。從前在相對高收入和雇傭保障方面具有來之不易權利的工人已經被一隊貧窮的——不僅僅失業而且是「在職貧窮」——勞動大軍所替代。這將導致在低收入和貧窮的工人階級產生大量的反抗。這一情形的發展可能會沿著英國十九世紀末期燃氣工人、碼頭工人和火柴工人反抗的方向發展。這可以對應於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在歐洲其他國家和美國等所發生的類似運動。資本主義制度的「教士們」的觀點是全球化的過程是無情和不可改變的，它是不能夠被停止的。而且，無論在新殖民世界還是在世界經濟的工業化地區（現在變成去工業化）中，它將會最後藉由在新的行業中創造新的工作而益於每個人。

請將這個理論告訴墨西哥加工出口工廠（Maquiladores）的女工們吧。貪婪的的老闆偏愛女性勞工，通常是單親母親，因為她們是最沒有能力通過罷工行動來抵抗資本驅動的減薪和工作條件的衝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支持者們——在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間——主張說協定將給北美和中美的工人階級帶來相互的利益。但事實相反地是，數以百萬計的美國工作被重新安置到墨西哥，雖然據說這些工作「有利」於墨西哥工人階級，但實際上他們的工作條件反而惡化了。

從他們切身的經歷，工人階級不可避免地會產生這樣的想法，雇主不應該被允許像一個孩子關閉火柴盒一樣兒戲地關閉工廠，或者在沒有反抗的情況下隨意將生產設備從一個國家或大陸轉移到另外一國家和大陸。

我們需要為不同國家的工人建立共同政策並將其植根於工人階級中——舉例來說，在歐洲在下個階段通過工會來協調共同的工資。相同的過程也將會在中國、印度和其他地方的工人間發展起來。他們已經開始強烈地抵抗企圖過度剝削他們和他們家庭的新的貪婪資本主義制度。這一在工業化的版圖上產生的新的國際主義也將相應地出現在政治地域內。雖然仍然在蹣跚的摸索之中，但他們已經開始作出各種努力以尋求與國際的、整個大陸的和世界政治範圍內的抵抗相聯繫。雖然他們仍然是烏托邦的概念，甚至例如像英國環保作家喬治·夢貝爾特（GEORGE MONBIOT）所作出的提議建立「世界議會」（在他的書《共識的時代》中有概略說明）以檢查和控制資本主義，但這都顯現出了在反對資本主義的運動中所提出的對於現存的問題的各種國際的和政治的解決辦法。

而這一個過程在1990年代在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產生的巨大貧富兩極分化下進一步加速。2002年地球上的最富有的十個人所共同持有的財產為二千六百六十億美元。這是 富有的國家向貧窮的國家提供的所有年度援助的五倍。這差不多足夠支付完成聯合國的「千年目標」的所有目標，像是遏制和

限制愛滋病、瘧疾和其他的傳染性的疾病的傳播，減少嬰兒死亡率三分之二和從現在到2050年間降低分娩中母親死亡量的四分之三。

統計資料充分地表明世界貧窮程度的深度和廣度。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口都知道全球有一半人口每天依靠2美元或者更少的費用來維持生活，五分之一的人口的每天依靠少於1美元的費用來維持生活。儘管全球範圍內食物存有盈餘，但仍然有八億四千萬人被官方確認為營養不良的，原因在於他們缺乏足夠的金錢來購買充分的食物。在世界各處有一億八千四百萬人處於失業中（這數位已經排除了那些「就業不足」人口）。世界銀行估計，有54個國家總共七億五千萬人口的實際收入在過去10年中減少。

這個星球上的真正權力被500個個人所控制（其中多數為富有男性而少數是女性）。他們控制了多數的生產資料——勞工、科學和技術組織等等，世界資本主義的機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擁有如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同盟所支援——成為世界最終需要服從的力量，並通過市場的所謂「看不見的手」反映出來。國家政府似乎無力對抗這些「投資者」，在這個新的解除了管制的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體系中，他們能夠迫使各地政府向他們曲膝，除非政府跟隨他們像順從的狗一樣。美國的克林頓總統處於市場的壓力下，尤其是政府債券的買主的壓力下，被迫在1993年放棄他溫和的改革計畫。克林頓將他自己變成了「艾森豪的共和黨員」，從而滿足這位前總統所說的那些「債券交易商雜種」。⁴

全球性反抗的第一階段

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運動代表了國際性反抗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第一階段。

它所帶來的巨大益處是動員了數以百萬計的人民，尤其是年輕人們首次參與行動。並非所有參與這些運動的人們都是有意識地反對資本主義制度，最初他們僅是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對於生活水準、環境、日益的軍事化、發動戰爭的影響和由此制度而為人類所帶來的恐懼未來。

迄今為止，勞工運動和工人階級參與反對資本主義運動還通常處於一個從屬的地位而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力量或者擁有自己的政治旗幟。這是因為在歐洲和其他地區的工會右翼領導人在前工人階級政黨的支持下所起到的作為資本主義「防波堤」的作用。然而，我們不應高估這一運動，而應該通過其而窺探未來工人階級群眾運動的景象。工人群眾的運動會有更高的覺悟，意識到資本主義是繼續進步的障礙，而且工人會本能地提出階級訴求，作為世界上各種問題的解決方案。

反對資本主義運動集中於反對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源於這一運動的眾多領導人的政策。他們不相信他們能夠直接攻擊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因此希望引導到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某一方面進行批評。因此

一些人，如英國著名環保分子夢貝爾特將批評聚焦於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甚至聯合國。當運動中的一些積極參與者建議對這些機構進行大力的「改革」的同時，夢貝爾特顯示這些改革實際毫無用處。雖然夢貝爾特在對制度進行如此尖銳的批評，但在實際效果上他仍然退縮了，仍然試圖在制度內部中尋找解決的途徑。

當夢貝爾特和運動的其他領導人被阻礙而沒有進一步前進，數以百萬計來自底層的人民參與的運動已經跨越了這一界限，在未來它將更進一步發展。運動的活躍分子正在尋找一個政治綱領和思想以建立一個真正「不同」的替代世界。這將不是一個改良的資本主義綱領而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綱領。反對伊拉克戰爭的群眾運動導致在社會內所有階層的政治覺悟的深遠的變化，尤其是對於年輕人們。馬克思主義者一貫指出戰爭是「革命的助產士」。例如日俄戰爭成為1905年俄國革命的先導，一次世界大戰成為1917十月革命的前驅。雖然迄今伊拉克戰爭還沒有導致一場革命，但在伊拉克發生的大規模抵抗以反對佔領潛在的成為了一場革命的開始。在被一系列令人激動的事件所推動導致的人們的激進的觀點中，它已經引起了一場革命或者是革命的開始。許多人在腦中提出了對替代選擇的需要，其中的一些傾向社會主義。

一個關鍵問題在於如何中實現這個在運動中越來越多階層所追求的「新世界」。歷史，包括近來的歷史說明，這不可能依靠自發或者半自發來實現。整個20世紀是由工人階級英雄般的運動，革命和反抗，並最終從資產階級那裡奪取權力所記錄的。在一些案例中，權力從工人階級手中滑落。例如1936-1937年的西班牙，最初整個國家的五分之四在工人階級的控制中。1973年的智利，在阿連德時期，整個國家的40%的土地和工業被從私人手中獲取過來；1975年的葡萄牙，來自於底層的群眾運動迫使政府對銀行進行國有化，通過銀行的國有化控制了全國70%的工業。工人階級失敗而交出權力不是完全因為他們政治上的「不成熟」，而是由於他們的組織，特別是組織的領導人，即群眾性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政黨的領導人，被證明是運動的障礙。幾乎在每個實際案例中，這些領導人不是通過革命來尋找方法滿足工人階級的需求和要求，而是直接將權力交還給資產階級。

「國際」

所有這些運動都是本能的國際主義的——在國際範圍內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從而帶來的結果是從世界工人階級中獲取巨大的支持。

從作為一股力量的一開始，工人階級就不僅是在國內的範圍而是在國際範圍內尋找解決的方法。1840年代年輕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組織了共產主義聯盟，而當時英國的人民憲章運動——世界範圍內第一個獨立的工人階級的工業和政治運動——的影響還存在。事實上世界範圍內工人階級獲取政治權力曾經有過5次不同的嘗試：共產主義聯盟，國際勞動者協會，也由馬克思和恩格斯組織，社會主義國際（第二國際），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和隨之而來的是俄羅斯革命，以及

托洛茨基的「第四國際」。正如我們解釋和說明工國委的歷史，所有這些組織在提升和促進工人階級的力量和政治認識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但是在21世紀的最初十年，當資本主義制度表現出它的衰敗，同時全球化提升了對於真正的國際主義和一個國際組織的需求的時候，目前卻沒有一個基於群眾性的政黨基礎上形成的大規模的工人階級的政治性國際組織。工國委的任務是幫助創造條件來形成這樣一個國際組織。但是這只有建立在對過去歷史上經驗教訓的學習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尤其是對於以前國際組織失敗的教訓的學習。建立這樣一個群眾性國際組織的重要一步是在各個國家範圍內建立群眾性政黨。直到這樣群眾性的政黨產生，那麼國際性組織的框架才會產生。一個具有生命力的群眾性國際組織的的胚胎只有在爆炸性的時期到來時才能夠產生。我們相信工國委能夠在這一過程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是政治版圖中殘留各種失敗嘗試的遺跡和想成為「國際」的組織（如果不是全部的話），他們中的一些在真正的工人階級運動之中只有很膚淺的根基。許多這些組織結構都是破碎的。許多中他們其實是功能上的機會主義或者極左派。很不幸，當中許多的組織還打著「托洛茨基主義」的旗幟。我們曾經在1997年的《工國委的歷史》一書中解釋過為什麼托洛茨基在1938年發起的第四國際的原始概念沒有能夠發展起來。它從來沒有成為一個群眾性的力量，儘管在1970-1980年代在一些地區，如斯里蘭卡，拉丁美洲，越南，法國和英國，托洛茨基主義曾經在勞工運動中有過強有力的影響。第四國際之所以沒有成功的原因在於恰不逢時的客觀原因和困難與後來第四國際領導人所犯的一系列錯誤相結合而造成的。

但是21世紀為向過去歷史學習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機遇。這個為建立一個國際組織而準備基礎的過程——至少是部分步驟——可以開始發展。但首先這是一項政治性的任務。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建立這樣一個與其他組織不同的政治組織的唯一理由是在於政策和政治綱領與其他組織的重大不同。而偶然、次要、個人乃至策略上的分歧並不是維持不同組織的正當理由，尤其是當這個組織的成員達到了數十，數百甚至數千為計的時候。

由於這個理由，隨著柏林牆的崩潰和新狀況的產生，工國委曾經試圖尋求與其它托洛茨基主義的派別在基礎問題上達成協議。我們與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USFI）進行過討論和聯絡。我們與「莫雷諾主義（MORENOITE）」派周圍的托洛茨基主義者進行過聯繫，他們大部分都在拉丁美洲。我們試圖且現在仍然在努力（很不幸沒有取的什麼成果）與國際社會主義趨勢（IST）建立共同的組織和聯盟，IST的主要力量是英國的社會主義工人黨（SWP）。我們以開放的方式進行這種討論，正如我們所做的和所希望的是這些組織能夠從中認識到他們過去的錯誤，重新調整他們的政治立場；從而為共同工作並可能就當前的政治協議創造條件。

但是很不幸，大部分這些組織面對新的世界形勢在對於工人階級和馬克思主義運動問題上的結論與我們的有所不同，而且有些是決定性的不同。以柏林牆倒塌為象徵的史達林主義的失敗是這些決定性不同的一部分，除非有正確的評價，否則這會導致錯誤的政策，綱領和組織。在這些組織中沒有一個能夠象工國委一樣快速和清晰地對於後史達林時代的主要特徵作出相應調整。

蘇格蘭社會主義黨

隨著史達林主義的崩潰而來的「可怕的九十年代」是許多組織機會主義變化的客觀來源。

令人意外的是工國委內部的發展——後來成為蘇格蘭社會主義黨的領袖人員使運動開始偏離革命托洛茨基主義的立場——不知不覺地鼓勵了這一個過程。蘇格蘭社會主義黨（SSP）的建立和選舉的成功現在已經為那些輕率地想從馬克思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的立場上退卻的人們提供了一個範本。在1990年代晚期在工國委蘇格蘭支部的領導決定建立一個廣泛的社會主義組織——蘇格蘭社會主義黨，而實際地拋棄了革命政黨，代表了與工國委的革命綱領策略和戰略根本性的決裂。這一發展是由一些過去在工國委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個人，如湯米·雪利丹（TOMMY SHERIDAN），阿倫·麥可比（ALAN MCCOMBES）和其他人造成的，但這不是一場意外。這是在激烈變化的政治氣候下，繼續主要革命綱領和立場所面臨的困難之產物。

這些同志的提議在最初階段與我們的分析和綱領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畢竟，它是工國委的領導層而不僅是蘇格蘭支部的領導層雪利丹和麥可比，他們最初號召建立一個新的群眾性政黨。這是基於我們關於英國的社會民主政黨（新工黨）乃至最終全球範圍內的社會民主黨派發生了「資產階級化」。儘管麥可比和雪利丹試圖將工國委多數派描繪為抵制建立廣泛性政黨的想法，但是這一論據沒有對工國委大多數成員帶來影響。

我們所反對的是他們以這一形式放棄革命的路線。關於這些概念和圍繞這些概念所發生的爭論可以通過工國委的網站（www.marxist.net）以充分地瞭解。面對這一問題的爭論，工國委的領導層在壓倒多數的工國委成員的支持下正確地預言這些此後成為蘇格蘭社會主義黨領導層的政治演化的必然趨勢。儘管他們否認這是他們的目標，但正如我們所預測到他們在政治上的墮落和他們的最終滑向蘇格蘭社會主義黨。這在實際上介入向改良主義的轉化，也等於宣告本來作為革命政黨的蘇格蘭戰鬥派工黨的終結。在開始階段，當麥可比和雪利丹在蘇格蘭社會主義黨內部建立國際社會主義者運動（ISM），這一現象還並不明顯。然而，在2003年1月，領導層提議解散國際社會主義者運動，因為蘇格蘭社會主義黨正在做「需要做的工作」的時候，情況就不同了。該提議由於那年的蘇格蘭國會選舉而暫時被凍結。但在當年十月這一問題再被提出。領導層同意繼續保留國際社會主義者運動，但在蘇格蘭社會主義黨內部沒有什麼熱情去建設它。他們之所

以需要保留這無組織的外觀，是因為來自國際社會主義者運動內部的政治反對派和因為這麼做會導致在蘇格蘭社會主義黨內部的其他政治平臺可以表達他們的政治立場，尤其是相對於工國委而言。真相是國際社會主義者運動事實上還是蘇格蘭社會主義黨領導層中的多數派。

儘管蘇格蘭社會主義黨部份地填補工黨左翼所遺留的真空地帶，在選舉中取得一定的成功，而且成員人數也有所增加。使它更進一步提高知名度是它在2003年的蘇格蘭國會選舉成功，並且使蘇格蘭鐵路、海事和運輸工會（RMT）成為蘇格蘭社會主義黨成員。作為結果，這一現象被一些國際上的「革命左翼」看做是如何建立新的工人階級政黨的基礎的範本。在實踐中，因為過分強調在需要上建立在「廣泛的」基礎上，使革命組織淹沒在這一新的組織形式中。這似乎被蘇格蘭社會主義黨的成功所證明。然而，顯然人們忘記了所有這一切是在蘇格蘭內有限達成的。假如關注在當地的具體條件和在其他地區的不同情況，這意味著不可能立即建立一個蘇格蘭社會主義黨式的政黨。毫無疑問地，民族問題在蘇格蘭的政治領域是個尖銳的問題，而蘇格蘭社會主義黨已經從中獲益。但是在英國和威爾斯的社會主義黨也在選舉中擁有良好的記錄。社會主義黨（工國委英格蘭及威爾斯）成功地在十一個地區選舉中獲取自己的位置，從而有了社會主義市議員的當選和連任。自從2001年以來，在考文垂地區大衛·納里斯（DAVID NELLIST）獲取的當選勝利成為相對新工黨的左翼政黨在英格蘭和威爾斯所獲的最好記錄。而且，當蘇格蘭社會主義黨在2004歐盟選舉期間在蘇格蘭獲得值得注意的5.2%份額時候，在相同的歐盟投票中社會主義黨（工國委愛爾蘭）在都柏林的愛爾蘭選舉中獲取了5.5%的份額。這些選舉結果強調了事實上不放棄一貫的馬克思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綱領也能獲得選舉支持。

我們歡迎和支持蘇格蘭社會主義黨的建立——儘管我們反對該政黨領導層的錯誤主張（較多的細節請見www.marxist.net）。但是我們堅持在蘇格蘭社會主義黨內部繼續維持和建立有清楚標誌的馬克思主義派別。這是與1990年代的所設立的戰術相符合的——捍衛和恢復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並且與此同時，在這些組織內繼續保留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建立新的工人階級的政黨的雙重任務。

蘇格蘭社會主義黨領導層堅持了第一項任務但放棄第二項在這個時代對於馬克思主義者而言極其重要的任務。由於喪失耐心——為在短期內獲得支持的期望所驅動，他們放棄了在工國委內他們曾經堅持的原則。今天，無論他們還是我們，也包括任何在國際運動中認真的組織都不再將蘇格蘭社會主義黨領導者視為堅定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他們盡可能表明今天的立場與他們在戰鬥派，蘇格蘭戰鬥工黨以及工國委中革命的過去所處立場之間的差別。

對馬克思主義立場的背棄

雪利丹的演講內容並非一貫保持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例如，作為蘇格蘭社會主義黨的會議召集人，他在

英國廣播公司上的一次採訪中解釋：「有一些國家成功地將公有制和高稅收制度混合起來...例如挪威和丹麥，他們設法將對富有者的高稅收和高水準的公有制混合起來。」

這暗示了資本主義的挪威和丹麥是雪利丹希望見到的蘇格蘭的範本。他然後繼續說道：「我不認為有需要要立刻使特易購（TESCO）國有化。我認為需要的是在特易購執行合適的工資和雇傭狀況。我們需要做的是為商業設置規則，你不一定要擁有它，你需要的僅僅是管理它。」（《先驅報》，格拉斯哥，2003年4月30日）

在相同的採訪中，雪利丹說：「我們正在說的是一個未來的社會主義獨立蘇格蘭，我們希望進行專業訓練和技術培訓的工作。我們想要提供一個高技術的經濟，為大企業提供富積極性的勞動力。如果那能在德國和法國運作，那裡他們能有較高的薪水，較好的生活標準而且生產較好的產品，為什麼不能在蘇格蘭奏效呢？」

姑且不討論雪利丹希望為大公司老闆們提供「富積極性的勞動力」，在德國一些工人們每小時只掙2或3歐元，法國工人的工資和雇傭條件處在總理拉法蘭（RAFFARIN）的新自由主義綱領攻擊之下，這難道就是他們討論的「高收入」！而且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下，「高收入」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其他國家都在變成過去的歷史。

蘇格蘭社會主義黨的報紙《聲音》，凱文·威廉遜（KEVIN WILLIAMSON），一個接近雪利丹和麥可比的作者站在沒有階級概念的「自由」的位置（他們也沒有就此作出任何評論）「那些純粹從政治角度地以資本主義制度或社會主義制度來判斷的人們還沒有作任何認真的嘗試來解釋如何才能阻止一個統治階級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中控制國家權力。而其餘的我們需要在前進中尋找實際的可替代的選擇。」

這些相同的蛻化——比較與他們在工國委時候的立場——表明了蘇格蘭社會主義黨在國際問題上的立場。這一趨勢表現為，對於卡斯特羅的古巴毫無批判的支持，他們將卡斯特羅稱為「社會主義者」，對巴勒斯坦—以色列衝突完全放棄社會主義對的解決辦法——即在中東的社會主義聯盟的框架下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巴勒斯坦和一個社會主義的以色列。在效果上，如2002年的蘇格蘭社會主義黨會議中，他們接受了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錯誤口號：「一個巴勒斯坦國和支持以色列人少數族群的權利」。雖然在後來的會議中這一個立場被軟化了，但在蘇格蘭社會主義黨的報紙和蘇格蘭社會主義黨領導人的公開演講中，獨立的巴勒斯坦國與以色列人少數族群權利的概念仍然會出現。如此的抽象口號永遠不會被以色列人所接受，因為這意味著他們自己的獨立國家被解散，而他們被強制地併入另外一個「巴勒斯坦國」。

在本文寫作的時候，因為沙龍當局的殘忍和鎮壓政策，在絕望的巴勒斯坦地區，多數的巴勒斯坦人面對營養不良和饑餓的現實看起來已經拋棄了建立「一個國家」的希望。一部分

巴勒斯坦資產階級已經放棄建立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的主意，而以希望在以色列國內為巴勒斯坦人爭取平等的權利而努力所替代。這一希望是建立在人口統計學的基礎上的——巴勒斯坦人口有更高的出生率，以色列猶太人在未來的十到二十年時間內將會變成他們自己的國家內的少數人口！當然，以色列資產階級永遠不會接受如此的解決方案。如果必需的話，他們傾向於會強行驅逐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和重新分配地區。換句話說，一個延伸的永無止境的血腥衝突將成為任何「單一國家」的提議的結果。但令人諷刺的是這也適用於沙龍提議的為巴勒斯坦人建立一個類似於南非種族隔離政策似的「班圖斯坦」的真正的「二個國家」的政策。雖然在目前的短期內，社會主義的思想看來是暫時淡化了，但從長期看來，最後它將會得到多數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口的支援。

蘇格蘭的前工國委成員在政治上、理論上而且組織上的逐步倒退成為影響其他類似的曾經宣傳是馬克思主義的組織的相同轉變過程的標誌。他們其中的一些仍然正式宣稱是在「革命的左派」和甚至「托洛茨基主義」的旗幟下。對於澳洲的民主社會主義黨（DSP）、國際社會主義趨勢（IST）和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而言，蘇格蘭社會主義黨領導人所選擇的途徑也成為他們向右轉的「靈感」甚至是當做一個「範本」——由此可知這種類型政黨的原型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建立起來。

從卡爾·馬克思的時代起，科學社會主義，用托洛茨基主義者對它的表達，根據《共產主義宣言》的原文來描述，一直將它看作是「現在的運動中的未來的運動」。當它總是與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和政治理解力的真實水準相聯繫的時候，那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關於綱領、手法和組織等議題上的任務是與工人階級中更為先進的那部分對社會主義目標的關注是直接相關連的。這必然地導致了在一貫的馬克思主義路線，左派改良主義的，甚至與溫和中間路線之間的思想和方法都會在社會衝突尖銳時期變得清晰起來。那些希望追隨蘇格蘭社會主義黨領導人腳步的組織和黨派事實上是犧牲了工人階級的未來來換取今天的眼前利益。

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

在整個國際的範圍內，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UFSI，下稱「第四國際」）對於蘇格蘭社會主義黨充滿期待，而且蘇格蘭社會主義黨的行動越來越多的符合他們自己的政治觀點。

他們也許是被最廣泛認知國際性的托洛茨基主義的組織。然而，「第四國際」，正如它自己所承認，在2003年它的世界大會上有來自40個國家的參加者（並非所有的參加者都是「第四國際」的成員）。這與目前工國委在世界各地的支部，組織和成員的國家數目類似。當「第四國際」通過革命共產主義者同盟（LCR）在法國擁有相當的勢力的時候，這並不適用於大部分其他的西歐國家。不同的「革命左派」的國際組織的力量問題不僅是對於當前力量的分析也是對於其潛在力量的分析。這依賴於按順序地對於一個社會和工人階級

所正在經歷的和由此而帶來的各種政治結論的正確分析。一個組織是否擁有數十，數百，數千甚至數百萬成員確實關係到它所能有的實際效果，但最終和最後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當情況發生重大轉變的時候，這些組織的政治理念。除非在一個組織內部的或者不同組織間的雙方存在不能夠互相容忍的政治立場的導致無法在一個組織共存或者無法合併兩個不同的組織，否則形成或者維持不同的左翼政治組織是一種犯罪。同樣地，一個革命政黨是不同於任何形式的廣泛的政治聯盟，在那種情況下即使擁有不同的政治立場，組織，路線，其中一些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時候，大家都是能夠互相協調和合作的。

團結的需要來自於工人階級聯合自己的力量以反對共同的敵人——資本主義——的基本要求和傾向。任何政黨或思想流派反對這種團結的訴求都是會帶來災難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要總是尋求共同的基礎組織，特別是在工人階級中有真正的基礎組織，和在特定的行動中聯合處於前線的參與者。但這並不意味著以隱藏馬克思主義的旗幟或者弱化和不推動馬克思主義綱領的進步為代價，各個不同的「國際組織」的未來取決於他們現在和未來的政治路線，以及他們的思想對於現實狀況是否能滿足需求。

國際社會主義趨勢和「第四國際」都在一個相當的階段內沒有推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和托洛茨基主義的分析。「第四國際」，宣稱完全忠實於托洛茨基的理論，在知識份子的圈子內被視為「正統的托洛茨基主義」的代表。然而不幸地是這並非真相，我們將對「第四國際」的現狀和綱領進行分析和考察而展現出來。作為「托洛茨基主義者」為了承擔這一名稱需要捍衛托洛茨基的遺產，他的分析方法，和整體上他在工人運動中活動。但這絕不意味著無條件地接受托洛茨基所做的每件事都是正確的。在「第四國際」的雜誌《國際觀點》最近刊登的文章中出現了一系列對托洛茨基和他的思想與方法批評和攻擊。與其說他們引用的內容是托洛茨基所犯的錯誤——即他在一生中公開地承認的錯誤，而不像「第四國際」和它的領袖今天所不願承認的一倒不如說「第四國際」的作家攻擊的「錯誤」是他不曾犯過的；他們所指責的恰恰是他的優點而非他的弱點！他們如此所做的，可能恰是無意識地附和史達林主義者對於托洛茨基所謂的「弱點」的批評。

托洛茨基和革命的政黨

舉例來考量建立一個政黨需要的疑問。「第四國際」的書記弗朗索瓦·維卡門（Francois Vercaemen）寫了一篇題為：「黨派的問題：托洛茨基的弱點」。

維卡門批評道：「他的弱點是政黨的問題……托洛茨基沒有能力（1903-1917）或者機會（在1917之後）直接地參與革命黨派的構建，在主要方面（超越總的分析和遠景），也就是對黨派的政治聯盟和具體手法的苦心經營和實行，在中央領導層的集體工作，在政治組織結構的建立，與其他幹部和鬥士一起工作，在一個苦心經營的政治聯盟內針對黨內的鬥士優先進行內部交流的實踐。在1903年到1917年間，當與列寧分手

後，他並沒有試圖組織一個組織或者黨派（而把自己限制在作為一個記者和演講者進行活動）。」⁵

這一對於托洛茨基在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RSDLP）內的位置的難以置信的誤解反映了資產階級用一種「社會學的」的方式對革命進行解釋並對托洛茨基進行批評，而且這也反映了史達林主義者的中傷。托洛茨基的弱點並非如維卡門所宣稱的——這對政黨的特徵和需要的錯誤理解。他完全參與了社會民主工黨的活動，這要求在那一個階段了對一個黨派的特徵和需求進行理解。維卡門在「總的分析和遠景」中忽略了托洛茨基對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主要貢獻——在他奠基性的工作——《結論和展望》中解釋而且發展了「不斷革命的理論」。在這一方面，托洛茨基正確地預見了參與第一次和第二次俄國革命的主要力量，尤其工人階級的決定性力量作為主要力量與農民結盟從而能在1917年10月取得政權。

托洛茨基的錯誤——公開地為他所承認的，在他的《流亡日記》中舉例說明——不在於黨的問題或對黨的需求，或者對於黨派的特徵等等；而是關於他的「調和主義」，在1907年和1912年之間，他希望在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間能達成和解。他希望，正如在1905年革命中，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在大眾的壓力下被迫合作。附帶一提，在這個問題他絕對不是孤獨的。布爾什維克黨內的各個級別的成員在1906年和1912年之間，在一些場合向列寧身上施加眾多壓力，他被迫與孟什維克進行「聯合」談判。而且直到1917年9月，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黨員在俄國（除彼得格勒外）的許多地方都在統一的組織中。不像這些具體的「布爾什維克」，托洛茨基從未接受來自孟什維克的政治幻象，而是尖銳地並且廣泛地分清了布爾什維克與他們之間在政治綱領和遠景上的分歧。因此，在孟什維克政治特徵的描述上，托洛茨基站在列寧的這一邊。所以我們在此重複，托洛茨基犯的錯誤不是在於建黨的問題上。他的錯誤在於幻想社會民主工黨的兩翼在大眾的壓力下被迫聯合起來，並且接受他在不斷革命論中論述的政治路線和由此而來的戰略和戰術進行革命。而列寧在另一方面則更早和更清晰地認識到孟什維克對於即將到來的革命已經開始傾向於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理念。

儘管列寧的直覺更早和更清晰，但托洛茨基在對於即將到來的革命的分析更為確切，尤其是工人階級作為無產階級的主要代表力量帶領和引導農民大眾來獲取政權。作為一個歷史事實，列寧在二月革命及以後的時間內，事實上拋棄了二月革命後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公式」，而在實際操作中完全採用了托洛茨基的立場。

在托洛茨基和列寧之間關於革命的路線，戰術，戰略等沒有什麼本質上不同的地方。而史達林，加米涅夫或季諾維耶夫則跟他們不同。維卡門寫的是相當荒謬地：「是列寧的決定把他自己和俄國『真正的運動』相聯繫起來，並且與一系列複雜的社會政治危機相結合，而這些都風行並植根於在『城市的』俄國社會的布爾什維克中。這裡具有決定性的是列寧的政策而並非是他的關於黨的「概念」，例如普遍瞭解（民主集中制，總綱領）……這是托洛茨基的政治弱點，是基於他在

組織水準上的失敗。一個人能夠根據以下的方式所列出：在1917年之前，他用他非同尋常的能力抓住時代發展的重要趨向並且提出了戰略性的展望但未能發展出一個革命性的政策（而且他不能或者不願意創建一個戰鬥的團體）。他在黨建的弱點在於這一框架之上。」

而且仍然如我們描述過的，與其說是列寧不如說是托洛茨基對於革命力量的遠景和俄羅斯革命的後果有著最清晰的認識。維卡門相當正確地讚美列寧關於1917年的政策一然而卻說這是「托洛茨基的政治弱點」。而關於這一切的全部內容，我們已經在以前許多次史達林主義者對托洛茨基的攻擊而進行辯護！而他在近來這些日子對於托洛茨基所謂錯誤的批評來源於「第四國際」自身沒有能力在過去建立起相當規模的組織。維卡門指出他的組織在1965-68年間的失敗，並且與1895-1914年時期進行比較，當時列寧能夠建立起一個革命黨派的框架並使之成熟而且最終在1917年10奪取政權。然而不幸地是維卡門誤解了1965-68年時期的整個特性以及其中不同的危機。他宣稱1968年5月事件之前史達林主義和社會民主派已經開始「分裂」了。但這不是真的。修正主義組織和其他有覺悟的組織總的來說仍然在那時候用他們共同行動控制著當時大眾的思想。對於我們作為馬克思主義者而言，社會民主派和群眾性的史達林主義政黨是客觀存在的因素，只能通過各種事件所克服。從某種程度而言，這正好是發生在1968年5月-6月間法國的一系列革命事件。然而由於當時群眾性革命黨派和領導人的缺乏使得史達林主義的法國共產黨和修正的「社會主義者」能夠重建他們的控制和使潛在的革命脫離軌道。

在英國1970到1980年代，戰鬥派——社會主義黨的先驅——在利物浦和反人頭稅的鬥爭中取得突破性的進展。然而不幸地是，如同我們在其他地方解釋過的，這個大有希望能夠建立群眾性革命政黨的萌芽被1980年代的經濟繁榮和史達林主義的崩潰所摧毀。將維卡門對於托洛茨基角色的重新描述和所謂的托洛茨基關於組織和建黨的「弱點」，和他的轉化後的政治批評相結合，事實上是由於沒有耐心而背叛，走上目前組建這麼一個政黨和這麼一個力量的道路。這一任務包括理解在不同的階段工人階級和它們的政治理解能力，意味著某些特定的階段反對潮流，甚至冒著被控告是宗派主義的危險。但是這也意味著建立一個工人階級的組織架構，將黨植根於工人階級的環境和組織中——如工會和合作社等，並尋找機會，在時機出現的時候建立起群眾性或者半群眾性的基礎。

不可置信的是，維卡門指責托洛茨基「在支持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的選舉的問題上是『既不堅定的也是混亂的』（甚至在1905年之後）」。

但是維卡門沒有做任何嘗試去解釋他意謂著什麼。然而當涉及到農民問題的時候，他直接地攻擊托洛茨基和藉此對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理論的主要成份之一進行攻擊。維卡門說道：「在1906年及隨後的數年中，他滿足於自己在那個時代（後馬克思主義時代）在歐洲馬克思主義偏見的基礎上進行的二個理論性的概括：歷史性的看，農村會跟

隨城鎮，農民會跟隨無產階級（工業化的，城市化的）；同時，農民沒有能力建立一個自治的政治路線和建立一個獨立的組織」。他繼續附和史達林主義者和近來澳洲的民主社會主義觀點（DSP）的理論上的「史達林主義者」的批評，並論述道：托洛茨基並沒有象列寧那樣去尋求建立真正的工人和農民的同盟並滿足他們的要求。但是由於理論抽象的特徵，為托洛茨基提供證明了一個真正的圈套。」⁶這不過是附和了史達林主義者的所謂托洛茨基「低估」了無產階級革命潛能力的論點。

不斷革命

蜜雪兒·羅伊（MICHAEL LOWY）在《國際觀點》上也表達類似的觀點，據說是為了給不斷革命理論進行辯護。

其寫道：「不斷革命的理論在20世紀歷史期間已經被檢驗過兩次。在一方面，由於階段主義導致引起的災難，來自於在獨立國家中的共產黨們盲目應用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集團和史達林主義的分階段革命的教義，這發生在1936年的西班牙，1965年的印尼和1973年的智利。」⁷

羅伊然後繼續說理論也在另一方面被查證，「因為這一理論，正如它在1906年形成時那樣，主要使我們可以預測、解釋而且弄明白20世紀發生的革命，在周邊的國家中發生的全部是『不斷』革命。所有在俄國、中國、南斯拉夫、越南或古巴所發生的，在其寬廣的主題上，都與托洛茨基的中央思想所聯繫：混合的和不斷的革命的可能性——民主的和社會主義的一發生在一個邊緣資本主義的國家、依賴性經濟的國家或者殖民地國家中。整體來說事實上，1917年10月革命之後的革命運動的領袖們並沒有認識到此後這些革命「持續不斷」的特徵。（其中有一些例外，如埃內斯托·哲·古華拉），或是後天做的而且應用於不同的術語之下，而且從這一歷史性的有效聯繫中什麼也沒學得…

「今天就如昨天一樣，在各個社會的議程中所發生的革命轉型都發生在系統周邊的國家而不是系統中那些中心國家。在印度發生的社會革命無論是從它的綱領，戰略和主要驅動力是不同於在英格蘭發生的純粹的「工人革命」。決定性的政治角色——當然不為托洛茨基所預見！——在今天的許多國家中是本土的農民運動（如墨西哥的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EZLN）、巴西的無地工人運動（MST）以及厄瓜多爾原住民民族聯盟（CONAIE）等，它們充分顯示了農民土地問題的重要性和爆炸性以及與此相關連的民族解放。）⁸

這兩個觀點是完全錯誤的。第一，托洛茨基瞭解動員農民的重要性，特別地在俄羅斯無產階級僅是一個極少數力量。但他是絕對正確地判定農民階級是多元的而且也沒有能力去獨立獲取政權並維持這一政權。在某種意義上，羅伊是正確地指出中國、南斯拉夫、越南和古巴發生的革命的勝利驗證了不斷革命論。但這些勝利並不符合羅伊的經典的感覺，而只是一個歪曲模仿的諷刺畫。除了俄國在1917年之外，工人

階級沒有能直接地獲取政權，或者建立獨立的工人組織——如蘇維埃等。在中國革命中毛澤東所領導的波拿巴式的軍事派別引導下動員廣大農民取得政權並在不同的階級間保持平衡，因而建立了一個沒有史達林的史達林主義政權。

而這一切都沒有在「第四國際」對於這些國家建立過程的分析中所體現出來。因此他們在「農民」的問題上犯了根本性的錯誤。正如我們在《工國委的歷史》中所描述的，這造成了「第四國際」過去在遊擊主義戰術，和農民在革命中的角色等一些問題上所犯的錯誤。並導致「第四國際」支持在烏拉圭和阿根廷進行的遊擊主義軍事冒險，年輕人的生命之花和工人階級的領導人亦因此在與政府進行的毫無意義的軍事冒險中被白白浪費。同時「第四國際」也向愛爾蘭共和軍（IRA）給予了毫無譴責的支援，並追求許多其他類似的冒險。

然而不幸地是「第四國際」迄今沒有從他們的錯誤有所學習，這正表現在羅伊在農民問題上對托洛茨基的立場所做的評價。他說到：「與其說托洛茨基分析的缺陷是『社會學』上的不如說是戰略本質上的：要考慮農民階級作為一個『小資產業主』階級，他們的政治視野不會超越對於民主的追求，他們只能『支援』無產階級的革命。舉例來說，他很難去接受中國的紅軍是由多數人口的農民所組成。正如許多俄羅斯和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樣，他的錯誤是沒有做到有批判的去接受馬克思在《十八世紀霧月政變》中關於法國農民是一分散的小資產階級的評價，而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應用此理論是具有非常不同的特點。然而，在他最後的著作《俄國革命的預想》（1939）中托洛茨基主張馬克思主義者對農民階級的正確評價並不認為農民作為非社會主義階級具有『絕對的和不變』的特徵。」⁹

這些對於托洛茨基的批評從頭到尾都是錯誤的。在農民階級間的精確平衡，即在小農或產業主、貧窮農民和無地農工間，哪些階層是可歸入無產階級的問題，在對大陸與大陸之間，甚至國家與國家間都是不同的。但是來自於馬克思自己的馬克思主義關於農民不同種類特徵的總的主張即使針對今天的新殖民世界仍然是完全有效的。馬克思絕妙的思想早已經在各種革命中所證實，即只有工人階級在有組織的大工業中由工廠和大車間的訓練才能發展出必須的社會內聚力並最終發展出必須的政治覺悟從而能夠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大轉變。這即是俄國革命的經典表現，也甚至可以應用於其他如中國的並不「經典」的革命形式。

中國、南斯拉夫和古巴

事實上，托洛茨基關於中國的著作，特別是他關於毛澤東1930年代的「紅軍」的描述，是相當明智而正確的。

他指出這個運動是對在1925-27年所失敗的工人革命後的農村呼應。他說正在領導這運動的前共產主義者們會在一個時期內發展出一種對於工人階級的懷疑和敵意，而且即使是在他們獲取勝利進入城市後也是如此。這是因為他們被農民階層

所在農村環境所決定，那是他們的基礎所在。這不正是當紅軍擊敗國民黨控制中國主要城市後所發生的事情嗎？在他們佔領這些城市之前，他們要求群眾不要起來反抗，並警告罷工會將遭到懲罰。因此這裡既不存在蘇維埃，也沒有獨立的工人階級或農民階層的獨立組織。托洛茨基對此預言到，正如歷史上所有的農民運動，中國的紅軍可能會勝利並可以擊敗國民黨，但它仍然將保持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框架內。這可能會導致建立另一個王朝，並退化產生一個資產階級封建政權，由此新的反抗和農民革命會再次發生。

在中國事件並沒有完全地按照這個樣子所發生更多的是由於世界格局的力量平衡在中國的體現。長期以來虛弱的資產階級和地主們隨同被擊敗的蔣介石的軍隊逃離了中國大陸。在這所遺留的權力真空中，毛澤東代表獲勝的軍隊領袖建立起了波拿巴式的小圈子。這一領導團體的小圈子在上層的不同階級間移動，由於來自下層的壓力被迫對封建地主和資產階級進行沒收。而羅伊所暗示的事實上遠不如托洛茨基所表明的農民階層，尤其是其中最低的階層如貧窮農民等，其實完全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甚至在俄國革命期間，如約翰·里德（JOHN REED）在他的書《震撼世界的十天》中指出，農民士兵們也將十月革命看作是一個世界性的社會主義的革命的開始。而且，在今天的部分新殖民的世界中，由於農民階層心懷絕望而且不可行的小規模土地計畫，使得「合作」的思想和「社會主義」的主張被證明是具有相當吸引力的，尤其是這主張是由植根於城市產業工人階級中的黨派所提倡出來的。然而，如果社會主義的革命能夠實現並鞏固，而且並在國際範圍內對於工人階級產生吸引力，那麼農民——「農村地區」——會仍然需要在城鎮地區尋找一個先進的力量。

馬克思，以及隨他之後的托洛茨基，說明了農民階級的的社會局限性和它的分裂而等級化的特徵，使之無法作為一個階級而能夠擔任一個獨立的角色。但是它可以扮演一個重要又必需的輔助角色以支持城市工人階級為奪取政權而發動的工業化革命運動。毫無疑問地是，在工人階級在社會中仍然是少數的地方，經典的工人階級起義可能會被一個「農民戰爭的第二版本」所「補充」——即農民運動，其中甚至包括遊擊主義的元素。但是工國委根據托洛茨基的分析方法對它們之間做了清晰的區別。作為工業化地區工人階級運動的輔助角色，在農村地區的人口中所使用的遊擊主義鬥爭方式是與相應在工人階級中使用這種鬥爭方法完全不同的。這應該是對於馬克思主義者而言是和ABC一樣的基本常識，尤其是對於那些宣稱自己是托洛茨基主義的人們。然而不幸地是「第四國際」在這個問題和其他問題上都出現了理論上的退化。在實踐中，如果「第四國際」在群眾運動中具有影響力的話，那麼這可能導致在未來的災難。

這也一樣適用於「第四國際」對於「官僚化」政權的描述。他們宣稱對於鐵托治理下的南斯拉夫，古巴和中國的政權是持有批評的態度。然而，這些「批評」的基礎都是接受承認這些國家是相對健康的工人國家。如果「官僚主義」元素存

在法國失去的機會

在歐洲，「第四國際」的最主要的國家支部是在法國的革命共產主義者聯盟（LCR）。

從1995年以來的一些場合，包括在最近的選舉中，建立一個新的群眾性工人政黨的決定性步驟的機遇是存在的。革命共產主義者聯盟與「工人鬥爭」（LO）看起來獲得了相當抗議向右轉的「多元左派」，即以法國社會黨（PS）為主也包括法國共產黨（PCF），的工人階級和年輕人的支持。例如在2004年1月，法國地方選舉前2個月，民意調查顯示9%的法國人會投票支持LO/LCR，另外有22%的人會認真考慮投票支持LO/LCR。但是此後LO/LCR聯盟遭遇了一系列的挫折。在歐盟選舉中，它只獲得了3.3%的選票並失去了它所有5席歐洲議員的席位。

當選民為了擊敗右翼黨派而彙聚支持一個「看起來不那麼邪惡」的偏左黨派時，一些較小的左翼黨派在短期內可能遭遇選票的流失。但是LO/LCR進行了一個毫不突出的競選運動，他們沒有進行充分的準備去解釋推進鬥爭和清晰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需要。他們攻擊「傳統左派」政黨，如前社會民主主義的PS是「社會自由主義」——無論這是什麼意思！但他們沒有明確提出新的工人政黨作為取代資本主義政黨的社會主義道路。它被作為在選舉後的事情而放棄了，於是同時另一個機會被丟失了。

真正需要的，是一場積極的競選活動和為建立一個新的工人政黨而制定的行動計畫。就在2年前，LO/LCR的聯合選舉在第一輪總統選舉中獲得了10.4%的支持，這表達了對即將下臺的PS/PSC政府的反對。反對讓-瑪麗·勒龐（JEAN MARIE LE PEN）的運動是一個為建立一個新的工人政黨而進行廣泛運動的巨大機遇，而勒龐就是靠擊敗當時的總理若斯潘（JOSPIN）並取得第三位，而進入第二輪總統選舉的。

但相反地，革命共產主義者聯盟依靠口號，「在街道上和在投票所內打敗國民陣線」，從而沒有呈現一個獨立的工人階級裡立場，並且允許工人階級轉移到來任總統希拉克身後。並被廣泛認為是完全腐敗的希拉克在第一輪總統大選中只獲得少於20%的選票，但在第二輪投票中獲得了82.15%的選票。這為第二輪選舉勝利提供基礎從而使右翼和此後形成的政府有信心攻擊工人的基本權利，例如進行社會福利和退休金「改革」等。

在2003年5月和6月，曾經有另外一個機會去建立一個新的工人黨派。反對政府進行退休金改革的抗議導致了近乎總罷工的一種情形，數百萬人示威以反對右派的拉法蘭政府。當時在每個人腦中都知道需要一個群眾性的政黨以捍衛工人階級和貧窮者的權利，沒有人相信「多元左翼（Gauche plurielle）」（社會黨、共產黨和綠黨）能夠提供什麼任何替代選擇。

在2003年5月25日之星期天的大規模的示威後的一星期，所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47%的被調查認為如果讓社會黨處理退休

在的話，那麼它們也是被認為類似於在俄國1917-23年還是一個相對健康的工人國家時所存在的一種變異的「官僚主義」。厄內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作為前「第四國際」理論領袖，堅持這一觀點反對工國委的時候，對於這一分析我們從根本上不同意。¹⁰例如說，我們反對「第四國際」所提出的鐵托是個「不自覺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說法。這包括當鐵托在1949年與史達林發生衝突的時候，「第四國際」派遣志願者前往南斯拉夫。然而，鐵托事實上是個「民族主義的史達林主義者」，他通過與史達林的勾結來控制政權（因為鐵托是模仿莫斯科的政權的形式），他反映的南斯拉夫官僚階層的民族主義史達林主義者對於莫斯科的「老大哥」的反對。

相同的分析方法也被「第四國際」用於分析在1950年代後期和在所發生的中蘇爭端。在那一階段，曼德爾相信在中國不在需要進行「反官僚主義革命」——即政治革命——因為毛澤東的政權是一個相對健康的工人國家，只不過帶有輕微的官僚主義的變異而已。但是這一立場是完全站不腳的，根據現在所披露的事實，——實際上的那些罪行——毛和其繼任者所做的是鎮壓和遏制了中國廣大群眾基本的民主權利的需要。

關於古巴，「第四國際」的領導人們犯了相同的錯誤。這場革命對帝國主義而言確實是極大的打擊。我們以及「第四國際」都相當熱心地支援了這場革命。我們認識到它在世界範圍內，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和新殖民世界所產生的巨大效應。然而，古巴革命的本質是略微不同於中國革命的，卡斯特羅政權仍然擁有廣大的群眾基礎。但是群眾沒有擁有獨立的手段去實現和控制政權，沒有罷免和選舉官員的權利，沒有清晰的上層和下層工人間在工資差額上的限制。¹¹我們始終如一地在帝國主義攻擊中捍衛古巴，但是在同時我們號召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的制度，因為這是唯一能夠保證古巴被帝國主義威脅和試圖讓古巴回歸資本主義之時——在古巴，拉丁美洲和在世界各處獲得群眾支持的保證。

現在看來當初在2003年夏天「第四國際」第15世界大會上所通過的一個決議是相當錯誤的，因為「第四國際」宣稱：「我們一貫以組織自治，工人自治管理和民主政治的名義，與那些自己宣稱為『社會主義』政權但仍然對民眾和工人進行壓制的官僚主義政權進行鬥爭。」對於「第四國際」領導人現在做出的結論我們是非常歡迎的，但是很明白這顯然並不適用於上述案例中。當一個政權的官僚主義特徵已經清楚的顯示的時候，作為事後諸葛亮提出批評是相當很容易的。而「第四國際」從古巴革命之初起，未曾提出一個清晰的托洛茨基主義的分析。這包括對卡斯托羅所採取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措施和對與失去信用的巴蒂斯塔政權相比較而建立的對古巴人民具有大量好處的計劃經濟的支持。「第四國際」做了這些，但同時他們拒絕號召建立蘇維埃政權和其他為建立一個健康工人國家所必需的需求並推動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運動。

金改革問題既不會更好也不會更壞（47%的人在教育改革上也是如此，50%認為在公共健康改革上也是如此）。在示威中，工人階級中部分階層指責由於極左派在當年較早時候的總統選舉中呼籲投票支持希拉克——並指出因此導致了一個強勢的右翼政府。在反對退休金改革的運動之後，當工會領袖剛剛藉由避免一個總罷工而挽救政府的時候，注意力再次轉移到了政治議題。¹²

今天的革命政黨

「第四國際」不但在法國和其他地區犯了一些錯誤，該組織還摒棄了革命組織的基本原則，背棄了列寧和托洛茨基關於革命政黨和革命國際組織的概念，反而偏好更為廣泛的組織形式——類似義大利重建共產黨（RC）和蘇格蘭社會主義黨（SSP）。

當然，在今天資本主義全球化和後史達林主義時代，無論在組織方法還是政治理念方面，僅僅生硬地重複過去的法則是遠遠不夠的。現在我們解釋為何需要組織的時候，亦需要考慮到新一代會懷疑組織會「自上而下」。這一撮人明確反對史達林主義和（在組織架構層面上模仿史達林主義的）前社民派的官僚性質，有時並表現為徹底拒絕「組織」甚至是「政治」（至少是資產階級的政治），以至是「政黨」的概念。因此，馬克思主義者不得不充分考慮這一問題。然而不幸地，有些組織出現矯往過正的情況，為了適應短暫和瞬間的群眾情緒，而採取機會主義的做法。在此問題上，「第四國際」簡直是拒絕過去的歷史，背棄自己組織的歷史，也背棄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義」向工人階級鬥爭所作的貢獻。

例如，「第四國際」最著名的支部——法國革命共產主義者聯盟（LCR）——的一名理論家丹尼爾·本薩（Daniel Bensad）的文章評論道：「列寧主義最具爭議性的特徵之一——民主集中制。」¹³

在1990年代，如同今天一樣，馬克思主義受到猛烈的攻擊。在列寧的黨概念、其在俄國所建的黨的特徵，以及其在今天工人鬥爭的應用問題上，工國委作好辯論的準備。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無疑一直強調民主集中制在集中的一面，是因為在沙皇的專制統治下進行地下鬥爭。與此同時，布爾什維克黨是極度民主的，是歷史上最民主的工人群眾政黨。如果沒有這一民主成分——尤其在1917年的2月至10月間完全展示出來的——工人階級或其最先進的階層並不可能在黨內找到自己的歸屬，群眾也不會將希望寄託在布爾什維克上，引發十月革命。在1990年代的某一階段，工國委考慮到，在史達林主義傳統的官僚集權制的扭曲下，造成了反對民主集中制的偏見，所以提倡「民主統一制」的代稱。然而，不久我們發現新名詞並不能澄清概念，反而將之混淆，於是不得不轉回使用列寧原來的名詞。若果對民主集中制的概念進行充分解釋，這一名詞能反映工人階級在鬥爭中對其組織究竟需要什麼。

工人組織需要最大程度的民主，尤其在現今資產階級在全球

散布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幻想。同時，資本家們又在經濟體系和國家機器上集中其權力。以自發、半自發和無政府主義的組織概念，來反對資本家集中的權力不僅力有不及，而且對於未來十年將至的工人階級的鬥爭是致命的。一個真正民主而集中的革命政黨絕非近似於史達林主義模式的，因為這是黨內自我任命的領導人由上而下進行官僚集權統治的等級制度。在現代，這一模式也被前社民黨領袖所模仿，如貝理雅的新工黨。20年前，工黨至少某程度上是英國工人階級鬥爭的媒介工具，現在這一政黨成為了既不民主又官僚的噩夢。

的確，新一代的年輕人和工人並不想要一個受僵化控制、領導層無所不在並被認為無所不知的政黨。例如，在英國建立一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必然擁有過去工黨在其形成階段的時代和其「最好的日子」裡的特徵。換言之，因為最初此黨必然代表眾多不同的流派，所以應該具有廣泛和聯邦制的特徵，並且歡迎所有願意在基本社會主義綱領的基礎上進行鬥爭的不同派別。

另一方面，一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可以以過渡形式存在，但一個革命政黨是不能的。革命黨代表了最有政治覺悟的革命力量的彙聚，當中各力量明白到需要建立一個鬥爭黨派的萌芽，並在之後階段爭取大多數群眾的支持。

今天這些革命政黨將不同於20世紀初列寧在俄國建黨時嚴謹的格局。這一革命政黨將大量地從布爾什維克黨的例子借鏡，而且還會加上每個國家的過去經驗 - 民主傳統和工人階級的鬥爭方式。黨的內部會如何運作 - 通過辯論與討論，黨內有組織的少數派將獲得言論自由，如何做到不僅在內部，也在公開地進行表達。在黨建立的初期，以上的問題都將被充分地辯論與討論。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絕對確定的：在最大程度的民主和討論是必須的同時，當一旦作出決定後，集體統一的行動也是需要的。每一個認真參與罷工的工人都能理解這一基本概念，在罷工期間少數派需要有紀律地服從多數人的決定，並必須接受並執行決定。對於革命政黨的行動而言，這沒有什麼根本上的不同。

但是，很不幸這一建黨路線被「第四國際」所遺棄，並以極端鬆散的組織形式所取代，而且在建立群眾性的國際組織上亦一樣如是。這樣一個國際組織應具有什麼特徵，而且該如何建立呢？「第四國際」的回答是 - 徹底背棄列寧的教訓，徹底遺忘托洛茨基的貢獻。不幸地，他們機會主義地屈服於1990年代的壓力下，並將這種做法延續至本世紀初。檢閱一下「第四國際」領導人就過去經驗、黨性質和當今所需的國際組織等問題所總結出來的「成績單」時，一切都變得清晰易見。最近「第四國際」世界大會上，其領導人出版了「一個國際主義的、多樣化的，革命性的、戰鬥性的，並在群眾中具影響力的新力量的章程。」他們解釋：「這一主張意味著對於第四國際的任務的重要修正。這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世界黨』（這是第四國際成立時的目標），甚至不再是這個未來政黨的中央核心。65年以來，這一宣言沒有聚合各種革命力量，反而以團體破裂和分離來標誌著。我們是眾多托洛茨基主義力量的其中一個，是眾多革命力量中的其中一

個。第四國際這樣的時代——懷著作為革命先鋒的願景，擁有努力戰鬥的龐大支援、正確的分析以及在托派運動內部成功的戰役——已經告終。」¹⁴

在別的文件中，「第四國際」表示希望採取類近第一國際的模式，一個廣泛而多元化的組織，而不是明確是馬克思主義或者托派的國際。在1990年代早期，工國委與「第四國際」和其他組織討論時，的確曾經建議，在托派運動和工人運動之前的新形勢下，一般而言，建立一個類似於第一國際的組織或者論壇，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這有利於澄清理論，並制訂共同工作的基礎。但我們從未視之作為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最終目標。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待第一國際的態度一樣，此一組織被視為過渡組織，及後在科學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向一個意識形態更為堅定的組織邁進。回歸至第一國際的概念，並視為歷史上的最終模形，對工人階級來說是一個錯誤。如果這樣的一個組織能建立起來，我們將參與其中，但是我們不會解散自己的力量，但仍然會在這一組織內維持自己獨有的思想、綱領以及組織。換言之，英國左派領導人物東尼·本（Tony Benn）和其他人所設想的，以全國性的新的工人群眾政黨構成「第五國際」，是不可能的。新的工人群眾政黨會由不同的團體彙聚起來，以建立一個聯邦形式的組織，當中能夠進行協調、討論並採取一些共同行動。然而，對馬克思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來說，這絕非最終目標的組織模式。

顯然，「第四國際」已經放棄了建立國際組織的思想，將其名字的含義——建立一個「社會主義革命的世界黨」——擱置一旁。「第四國際」甚至斷言自己沒有成為「這樣的政黨的中央核心」和國際組織的目標，並斷言托洛茨基在群眾革命性的第四國際的基本概念為「失敗」，以作為辯護理由。正如我們在《工國委歷史上》所指，「第四國際」組織失敗原因在於二戰所帶來的客觀現實結果，以及「第四國際」領導人（在托洛茨基逝世後）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所犯的錯誤。工國委從不相信能夠僅僅通過「努力戰鬥、正確的分析以及在托派運動內部成功的戰役」，就可以令托派思想的群眾性國際組織實現。¹⁵

一個革命性的新第四國際將是清晰思想的產物，以托洛茨基和國際左翼反對派的方法作為起點，並進行持續的更新和打磨，再加之新的群眾力量。前提是新一代的年輕人和工人，通過自身經歷而確切明白需要這一革命政黨。

國際社會主義趨勢／社會主義工人黨

國際社會主義趨勢（IST）和它在英國主要的組織社會主義工人黨（SWP）是另外一個在政治和戰術上犯的嚴重錯誤的所謂托洛茨基主義者組織，從而嚴重損害工人和年輕人結束資本主義制度的運動。IST/SWP在整個19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對「第四國際」採取了一個極端反對的立場，他們是相當極左和宗派主義的。但是最近他們也開始向右轉化，並越來越採取與「第四國際」類似的立場。

IST/SWP關於柏林牆倒塌的政治觀點從歷史上那個轉捩點以來是完全處於變化之中的。根據他們的觀點，對於馬克思主義者而言沒有什麼根本性的變化發生。他們如此天真而沒有意識到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被這一系列的事件所影響。然而正如我們看到格林斯潘在早些時候的評論所指出的，這既不是資產階級在當時也不是在現在的觀點。而且，任何植根於工人階級和它的組織的人都不能夠失敗到不能意識到曾經發生的事件——現在在社會主義者所遭遇的困難並且將由馬克思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單獨面對一系列對於「社會主義」思想的攻擊。

國際社會主義趨勢用他們「自願主義」方式有效地挑戰了政治領域的「重力」定律。他們通過首要吸引學生和極端化的小資產階級的做法在短時期內他們帶來了一些勝利，但他們的環境脫離於真正的工人階級和他們的觀點。他們對情況的誤讀來自於他們組織理論上的錯誤：他們的理論家，如東尼·克里夫（TONY CLIFF），所闡明的是「國家資本主義」的「理論」——他提出的「理論」最初是應用於史達林主義的俄羅斯，東歐和中國等。這些思想與托洛茨基在他豐碑式的著作《捍衛馬克思主義》的要點是完全不同的。工國委一貫反對他們這一理論。並通過泰得·格蘭特（TED GRANT）的著作《反對國家資本主義》而進行了徹底的回答，而最近還有彼得·哈頓（PETER HADDEN）的《社會主義的今天而鬥爭：對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政治問題的回答（The Struggle for Socialism Today: A Reply to the Politics of the Socialist Workers Party）》¹⁷和薩沙·史丹斯（SASCHA STANICIC）的《哪條路通往社會主義（德文WELCHER WEG ZUM SOZIALISMUS）》¹⁸和其他工國委的出版物對此進行了回答。

雖然IST/SWP經常宣稱它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但對托洛茨基的理論遺產卻具有決定性的分離，尤其是對應東歐和俄羅斯在史達林主義官僚統治下所關係的階級特徵。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他們不能夠被認為有一個真正的托洛茨基主義傳統的延續。

一個理論錯誤尤其是在蘇聯的階級性質上的關鍵錯誤或早或晚會反映在政策，方法和組織上的錯誤。這一案例甚至適用於當史達林主義國家，蘇聯這一錯誤的原由已經崩潰之後。這顯示了路線的錯誤。這相當清晰的顯示了IST/SWP。根據他們的說法，東歐國家和前蘇聯是「國家資本主義」制度，因此他們的崩潰並不被國際社會主義趨勢認為是工人階級歷史性的失敗。這僅僅是「邊緣性的變動」，一個資本主義的政權被另一個資本主義政權所替代。

這也涉及到國際社會主義趨勢的德國支部的失敗。關於1989年事件和柏林牆的倒塌，它描述道：「相對於不惜一切代價去捍衛東德（GDR）的獨立，社會主義者應該執行的任務是推動真正的工人鬥爭。在1989年12月初進行一場反對斯塔西（STASI）的總罷工和統一的全民投票是可能的。一個革命性的過渡政府將通過一場總罷工而產生並可以充分地解散斯塔西政權和舊有的權力機制並與科爾政府協商統一的條件。」¹⁹

換而言之，國際社會主義趨勢的德國支部支持德國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統一以及由此而給德國，尤其是東德和工人帶來的各種問題。而計劃經濟的解體——雖然被史達林主義所破壞和扭曲——對於這一「趨勢」將毫無意義。因此，他們認為這些事件對工人階級的政治理解和政治覺悟水準並沒有任何改變。

這一對於柏林牆倒塌後狀況的超現實主義的解釋與之前所提及的結論有本質上的不同。這些包括對於工人階級內的、在工會內的、在社會民主黨內的、尤其是當時在「共產黨」內的先進階層的觀點。從長期來看確實如此，揭露史達林主義用其骯髒的各種手段，如清洗、大規模放逐、陰謀詭計等而使勞工運動蒙受汙名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但是儘管存在史達林主義的兇殘專制的特徵，在東歐諸國和蘇聯存在的國有的計劃經濟相對於資本主義而言仍然是相當先進的。根據托洛茨基的解釋，這是鋼鐵、混凝土和水泥的語言，並在最初階段具有令人驚訝的增長率，至少這些經濟顯示出了國有計劃經濟對於過時的，混亂的和無序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優勢。他們的解體使得工人階級中先進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階層深感同情。而為了相反的理由，這一過程為資本主義世界的戰略家所慶賀。但對於國際社會主義趨勢而言，這竟然是沒有什麼根本性的後果！

過渡綱領

儘管目前國際社會主義趨勢形式上仍然堅持建立「革命黨」的目標，但尤其在英國，它尾隨「第四國際」，公然轉向機會主義的路線。

這似乎與他們在九十年代的政策截然不同。無論在政治上如何否認，現實早晚會體現出來。在九十年代末，國際社會主義趨勢開始反對政治上的壁壘。社會主義工人黨被迫調整以往的僵硬的宗派極左主義 - 「不參與選舉」、「打碎國家機器」等。哈頓在其小冊子《社會主義的今天而鬥爭：對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政治問題的回答》中，有力地指出這些錯誤。

根據1914前社會民主黨的格局，社會主義工人黨提出「最高」綱領 - 號召革命和社會主義、「打碎國家機器」和「最低」綱領 - 日常改革。在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宣傳和鼓動中，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是分開的。與之相反，托洛茨基根據在布爾什維克黨的經驗，在三十年代提出過渡訴求的綱領。這一綱領是根據當時的經濟狀況，在當時資本主義無法承受持久的改革。因此，認真為改革進行鬥爭將提出對社會主義改造的需要。

托洛茨基的「過渡要求」是工人階級從現階段的政治覺悟水準邁向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想的橋樑。但是國際社會主義趨勢以克里夫為首，拒絕這一思想。克里夫非常清晰表明其組織的觀點：「托洛茨基的過渡要求背後假設的是，經濟危機深刻得，即使是為工人生活條件進行最微小改良的鬥爭，都會與資本主義體系發生衝突。當生活反證了這假設，這一綱領的基礎消失。」²⁰

沒有一個綱領可以無視實際的歷史狀況而提出的。托洛茨基的路線在1930年代是有正當理由的。但是，克里夫沒有理解的是，在1945年後由於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回升，帶來了客觀狀況的變化，從而允許工人階級贏得重要的改革。即使如此，與克里夫的斷言相反，工人階級實際上還是實行了托洛茨基所描述的一些過渡要求。例如，在一段歷史時期，意大利工人通過「滑動工資表 (scala mobile)」實現了按通漲比例增減工資的計劃。在二戰後，由於工會廠房代表的委員會在英國和其他國家得以巨大發展，以稍有不同的形式局部實現了托洛茨基綱領所要求的「工廠委員會」。

但是，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所描繪出的狀況在今天變得成熟。正如上文講過，有機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已經形成，從而迫使統治階級猛烈打擊生活水準。這就意味着，為持續的改革進行鬥爭，將不免提出革命性社會轉變的要求。當然，這並非表示工人階級不可能再獲取重要的短期收穫，但這些收穫只是暫時性的，性質上並非持續，而且資本主義將不免嘗試重新將其剝奪。我們可以見證到法國統治階級的頑固，儘管在過去十年屢戰屢敗，但仍然試圖降低法國工人的生活水準，甚至打算取消工人靠過去鬥爭獲得的35小時工作制。

因此，即使今天的條件不同，綱領的類型和當中許多要求在今天會有所不同，但當托洛茨基的方法開始受認可之際，社會主義工人黨卻將之拒絕。在過去社會主義工人黨指責工國委尤其是英國的「戰鬥派」（現時的社會主義黨）對「修正主義」投降。但這並非事實，我們堅定不移地將工人階級的日常工作與社會主義的目標相結合，明確提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所提出的貢獻。有時候，社會主義工人黨也許會高喊「革命！」，但在大部分時間其日常活動僅限於最低綱領的口號，例如「向富人徵稅！」，與之相隨的，就是其對「左翼」領袖人物毫不批判的路線。

另一個揭穿國際社會主義趨勢的例子，是社會主義工人黨領導成員克里斯·哈曼 (Chris Harman) 撰寫的一本小冊子《反資本主義 (Anti-Capitalism)》，該書大幅描述反資本主義的運動，但沒有提出一個綱領性的提案，也完全沒有提及「社會主義」，亦無號召國有化跨國公司，將之置於工人的民主控制和管理，更無提出用一種民主計劃經濟以取代市場體制。他將反資運動和勞工運動視為兩個完全分離而無法結合的事情來分別處理。至於擁有社會主義綱領的新工人政黨的必要性，也未被提及。

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選票至上主義

過往，社會主義工人黨指責工國委為「選票至上主義」，但這並非事實。

例如，無論在1980年代利物浦地區，在過去和今天的高雲地利地區，或者是在愛爾蘭約·希根斯 (Joe Higgins) 成功的選舉工程中，工國委都明確號召需要民主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相反，社會主義工人黨在其選舉活動中並無清晰提出社

會主義。

從社會主義工人黨領導層在英國毫無批判地支持喬治·格拉維（George Galloway）的「尊重聯盟」，就可見一斑。由於渴望選票上的勝利，使其反對宣傳社會主義。其中一個鮮明的例子，就是英格蘭北部的約克大學教授兼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中央領導人阿力士·卡林尼克（Alex Callinicos），在2003年6月30日被邀請參加BBC4廣播電臺的「廣播大樓（Broadcasting House）」的辯論節目，與英國資本家組織（董事長協會）的政策主管魯絲·麗亞（Ruth Lea）和親資本主義作家羅伯特·凱斯（Robert Kelsey）進行辯論。當節目討論臨近結束時，卡林尼克被問到對於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然而他沒有一次提到社會主義。事實上，他聽起來更像一個自由主義者。他的回答只是簡單地說：現在是「超越資本主義」的時候了，並繼續說「我們將建立一個的替代模型」，又承諾道：「我們會想出一種更有希望的方式來運作世界」。最後，當其他辯論者挑戰他，指他主張類似於史達林主義的北韓時，他只說「會有很多更好的方式去運作世界」。問題由此而來，卡林尼克是否成為了一個「後社會主義者」，或者社會主義工人黨認為「社會主義」只能在局部圈子內討論，而不適合在全國性的廣播電臺？

在他最近出版的書籍《反資本主義宣言（Anti-Capitalist Manifesto）》中，卡林尼克提出的訴求是完全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的。他要求對控制資本，但沒有提出國有化大銀行和大工業。書中看似有提及經濟計劃的問題，但並不是作為過渡綱領的一部分。他的「過渡綱領」也不包括任何對於勞工運動的訴求，也沒有為工人階級的戰略提出方案。卡林尼克寫道，這些訴求應該意味著此刻的改良，但應該開始創造一個「不同的社會邏輯」。

在2004一場關於需要在德國建立一個新左翼政黨的討論中，國際社會主義趨勢團隊亦顯示出類似態度。他們不僅公開反對為新政黨制定社會主義綱領（在2004年6月該新政黨名為「選舉的替代 - 工作和社會正義」），甚至反對在組織內對此問題進行辯論，聲稱這將成為新分子加入的障礙。至少在三個場合，國際社會主義趨勢成員公開反對工國委成員和其他人提出「制度問題」，並支持修正主義者。

在反資的鬥爭中，例如在熱那亞，IST/SWP的主要口號是「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但沒有嘗試將之與社會主義世界的理念聯繫起來。工國委的國際書記處成員卜·拉比（Bob Labi）參與了這次示威，並評論道：「他們（在熱那亞）的愛爾蘭代表團有一張示威牌主張『不要自由貿易，要公平貿易』，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是一個烏托邦的訴求，事實上是暗示要求「更好」的資本主義。」當這一口號受到質疑時，國際社會主義趨勢的一名愛爾蘭領導人回答道：「為什麼你不能夠享受這一精彩的活動？看看這裡有很多人啊，別糟蹋它。」

「此外，國際社會主義趨勢在德國的組織『左傾』（Linksruck）為其成員發行了一份9頁的特報，其題目是《一個不同的世界是可能的！——熱那亞G8峰會抗議的簡報》。

雖然此文件強調以強大的地區根基去建立反資運動，但並無提出如何將之發展成社會主義的運動。事實上，在該簡報內沒有一次提及『社會主義』一詞。」

在英國，國際社會主義趨勢多名主要發言人曾經明確反對使用「社會主義」一詞。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林絲·日爾曼（Lindsey German）反對將之放入「尊重」（Respect）聯盟的綱領內，因為據稱「社會主義聯盟」由於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而導致選舉失敗！不必說，社會主義工人黨「政治」路線上有所轉變，並不表示其對待其團體的方法和手段會有改變，相反是顯得和從前一樣蠻橫。

另一個跡象顯示國際社會主義趨勢完全沒有能力正確預測情況 - 卡林尼克作為克里夫死後國際社會主義趨勢的主要理論家，在2002年3月寫及關於「革命社會主義在過去20年內的孤立…」²¹這段時期包括英國1984-1985的礦工大罷工、由戰鬥派（The Militant）組織和領導的壯大的反人頭稅運動，在英國工黨內圍繞東尼·本的激烈劇變，以及一個強有力的左翼的出現，所有這些都在那時發生的！這段時期，孤立的並非真正的革命社會主義者，而是在真正工人階級運動旁邊叫囂的宗派組織IST/SWP。例如，當利物浦市政會在1984年挫敗戴卓爾，並從政府手上取得巨大的讓步，社會主義工人黨卻在其報紙《社會主義工人》上譴責市政會，宣稱工人階級被「默西（利物浦）出賣了」。

相反，當客觀環境對真正的革命社會主義者而言變得不利甚至非常困難時，作為社會主義工人黨數十年來的首席理論家克里夫又是如何說呢？根據克里夫的說法，九十年代仿佛是「以低速運轉1930年代」。這正是俄國文學中的著名寓言中提及的，一個愚人在婚禮上唱葬禮輓歌，在葬禮上唱婚禮歌曲！此外，這一結論不僅在九十年代初（即柏林牆倒塌的政治反響尚未完全清晰時）被克里夫提出，而是貫穿甚至超過十年。由克里夫將局面粉飾為「沒有改變」，意味著國際社會主義趨勢的組織，尤其是（但不僅是）在英國的社會主義工人黨，在激進化年代的大前提下，繼續以狂熱的態度去建立組織，使成員的流動率很高。他們沒有考慮到廣大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處於低潮，提倡過分簡化的思想和口號，如「一個解答，革命！」。

在一段時期內，維持這一路線以建立運動是可能的，但會以犧牲內部為代價。當組織的展望有錯誤，並與IST/SWP成員現實的工作環境發生衝突時，必然會在組織內部引起疑問，後果是不免地從宗派主義轉向機會主義，並在2001年克里夫死後進一步深化，還採取極端機會主義的路線。在英國，這表現為附庸左派人物 - 或者是一些表面站在左派立場的人物，例如在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被逐出工黨後，以及他參加2000年倫敦市長競選期間。但現在利文斯通已經成為貝理雅主義的一支硬柱，為他重回工黨鋪下道路！在他重回工黨之後，在2004年市長的選舉期間，在投票率上升的情況下，利文斯通的第一選擇票雖然在絕對數上上升17,600票，但得票率卻從39%降到了34.5%。在2004年6月，利文斯通可恥地聲稱，他將會破壞倫敦地鐵工人的罷工，因為工人不接受他

在工資談判中苛刻的協定。

由工國委英格蘭及威爾士支部——社會主義黨，為了為未來新工人政黨打下基礎，謹慎地嘗試組織的「社會主義聯盟」，也因為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介入及其宗派主義的手段而遭到破壞。在社會主義工人黨加入前，「社會主義聯盟」曾經是眾多不同的小規模組織（除了社會主義黨以外），主要為選舉目的而進行統一戰線策略，是一次真誠的嘗試。但這一切都在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介入後發生了變化。社會主義工人黨恃著自己在倫敦的成員數量（尤其是大量的小資產階級成員）以及黨的物質資源，堅持建立一個由其預先規定的單一陣線，以反對其他希望能站在共同選舉陣線之上的左翼力量，例如在2000年倫敦市議會選舉中，由鐵路、海事和運輸工會所支持的「反對地鐵私有化」運動，以及其他單一議題的運動。

馬克思主義者在廣泛組織中的工作

社會主義工人黨雖然在資源上富有，但在意識形態上卻相當貧乏，尤其是當需要精心制訂複雜的戰略和戰術，為新的工人階級組織鋪下基礎的時候。

社會主義黨主張在社會主義聯盟內部採取聯邦式的路線，依循這路線可以發展共同理念和相互信任，並通過辯論而達成在綱領上的真誠協議。社會主義工人黨徹底拒絕這一建議，並企圖將自己的路線、綱領和方法強加在社會主義聯盟上，但在任何英國工人階級認真的鬥爭中，他們的方法沒有一個被證明是成功的。

但這沒有阻止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導人像孔雀自吹自擂自己黨的「重要性」。這可以通過約翰·里斯（John Rees）針對梅里·史密斯（Murray Smith）（一名前工國委成員，當初他離開「第四國際」加入工國委，然後再次躲在「第四國際」的行列）的答覆反映出來。在關於「廣泛的黨派、革命黨派和聯合陣線」的爭論上，里斯說道：「史密斯認為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發展與階級鬥爭的狀況只有些微關係似的，但事實上它是處於鬥爭的中央核心，並備受公眾討論的。」²²

在什麼方面社會主義工人黨是處於「中央」的？工國委的英國支部——戰鬥派（The Militant）曾經領導過兩次群眾戰鬥反對戴卓爾政府：1984 - 87年在利物浦的運動及反對人頭稅的鬥爭。在利物浦，這場運動包含了工人階級中牢固的產業，他們不僅支持戰鬥派的中央戰略和戰術，而且作為政治組織整合在戰鬥派之下，在一個階段中，在默西塞德地區有1000人組織在其旗幟下。在英國礦工罷工期間（1984-85年），我們總共招募了500名礦工，並在全國礦工工會（NUM）的重鎮裡發揮了重要影響。在這段時期，社會主義工人黨公然譴責其他正在領導鬥爭的組織，有時更使用刺耳的批評語調，有時則採取徹底消極的語調。例如在反對人頭稅的鬥爭中，克里夫在蘇格蘭的一次會議中，曾經惡名昭著地指出，不支付人頭稅就像不買巴士車票一樣！結果，社會主義工人黨在反對人頭稅的鬥爭中沒有扮演任何角色，在全英反對人頭稅國

家聯邦委員會中，沒有一個代表成員。但這沒有阻止社會主義工人黨事後在戰鬥派的支持者背後，無論在英國還是國際上，宣稱自己「真正領導了這場運動」。

結果是，正如里斯所承認，事實上他的組織20年來被排斥在工人階級真正的發展（包括挫折）之外。相反，他們懷著（尤其是在1990年代）長期激進化的希望來支撐，但實際上這段時期激進化並不存在。在一段短時間內，組織可以依靠不穩定的小資產階級元素，而非工人階級，在擺脫客觀現實的束縛下取得增長。但是不可避免地，由於黨內部政治圖譜不能應對黨員面對的日常現實，會為黨員帶來衝擊，「結帳」之日不免會來臨。在這種情形下，一個像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黨派會從最根深蒂固的宗派主義（徹底排斥工人階級和左翼力量）發展成為機會主義。

這一現象反映在很多議題上：在IST/SWP對伊拉克戰爭的立場、在「停戰委員會」內的策略，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對於英國工黨和其階級屬性的分析。正如他們自己所承認，IST/SWP已從一個立場轉向另一個立場，如里斯所說的：「在長期經濟增長的時期，我們最多只能建立一個像國際社會主義者（IS）這樣的一個鬆散但是意識形態清晰的宣傳小團體。」然後又宣稱：「1968年IS開始成長，隨後數年在工人階級取得細小但真實的成就…成為了一個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因此更為開放和鼓動性的工作，包括建立了大眾報紙…從而成為一個更「列寧主義」式的黨組織。」²³而里斯所不願意承認的，是這種工作方法不免會導致他們與一些組織內的工人發生衝突，而使後者迅速離開。例如，在萊賈斯特和其他地區的「基層組織」裡，只因礦工們顯示出最輕微的獨立性，便被克里夫武斷專橫地解散。那些曾經加入這些團體的成員被立即邀請加入社會主義工人黨，但只有極少數人應邀。

民主和政黨

社會主義工人黨從不能夠容忍在他們的組織內部存在反對派。

然而工國委和戰鬥派，雖然被社會主義工人黨和其他組織指責為「壟斷」但經歷過大量的派別鬥爭並且允許各派別實現充分的權利。這既發生在1992年格蘭特分離之前，也發生在1990年代後期工國委蘇格蘭支部的領導層雪利丹-麥可比離開之前。而在英國的社會主義工人黨內部這種機會是完全不可能發生的，他們不斷地進行中止權利和放逐。

例如2001年將國際社會主義趨勢（IST）的美國支部，國際社會主義組織（ISO）開除出去的案例。由於對國際社會主義趨勢的領導層（即基於倫敦及其周圍的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反對，使整個國際社會主義組織（宣稱有1000名成員）被事實上完全開除出去，只留下了極少數殘餘的對國際社會主義趨勢的忠誠分子。同樣的命運也被賦加於對國際社會主義組織表示同情和支持的成員，如希臘支部的大多數成員。

在建立國際社會主義趨勢的時候，克里夫宣稱其不像其他

所謂的「托洛茨基主義國際」。他說道它將更為民主。它沒有國際性的結構，沒有對於國際組織架構和國際領導層的選舉。據稱它的任務將是在國際社會主義趨勢這個大傘下鬆散地捆綁起各個國家的支部。但是由於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導層和美國的國際社會主義組織之間所表現出來的意見不同，這完全成為虛假的。英國的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導層決定著「路線」，任何對此反對意見將遭到紀律處分，而且沒有任何可以借助的支援如通過民主結構進行討論，或者申訴，或者推翻對他們決定的可能性。換句話說，這一所謂的鬆散、表面上「不僵化」、因而更為民主的國際組織在實際上恰恰是相反的。它允許其中最主要支部的領導層，英國的社會主義工人黨可以獨斷國際社會主義趨勢其它支部的政策、綱領和組織結構。你能夠用這種方法建立一個由「順服的傻瓜」組成的組織，但絕不可能建立一個真正有能力獨立地分析和達成決定的思考者和幹部的組織，而這些能力是對於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領導層而言不可或缺的必要素質。

相同的武斷專橫的方法也被社會主義工人黨用於社會主義聯盟內。這不可避免地與那些2002年時社會主義黨（工國委）離開之後仍然留在聯盟內的組織發生衝突。他們中的許多批評我們的決定，但是無可避免地與社會主義工人黨對聯合陣線或者甚至是與左翼基礎合作的基本民主程序發生衝突，因而無奈地步上我們的後塵。

為了服務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目的，英國的社會主義聯盟被殘廢了，社會主義工人黨決定將它置於新形成的「尊重」聯盟，它主要是為了2004年的歐洲選舉，而在英國圍繞被開除的前工黨議員格拉維建立的一個機器。因為這一項目格拉維的主要推動者，社會主義工人黨政策和方式的失敗，使期待這一組織成為新的群眾性的實際的或準備中的工人黨的希望被毀滅了。社會主義工人黨現階段的機會主義的偏差更為清晰地是顯示在關於工黨的關係上。例如里斯說道：「工黨在關鍵的意識上仍然是工人階級內的：它的獨立成員壓倒多數的是工人階級。」²⁴當工人們實際上參與其中並且有限地決定政策和行動，只有一個長期沒有在工黨內經歷的政治組織才可能做出這樣一個難以置信的聲明。

工黨裡工人階級的參與是很少的，而且在英國許多地區工根本並不存在。我們並不是唯一進行這樣宣傳的；里斯應該讀讀其他左派勞工出版社的評論，如《論壇》經常性嘲笑似地報告工黨黨員和前工黨黨員今天如何看待該黨的。那些不情願地而粘附於工黨的，主要是仍然保有歷史慣性的老一代——缺乏別的真正可替代的選擇，以及為求帶領工黨走上更為右傾的保守黨道路的人——這是他們參與和投票支援工黨的主要動機。但是如同我們和其他馬克思主義者所理解的，這個黨派在它的基礎上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的了。在過去他確實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工人政黨」，儘管其擁有一個資產階級或者親資產階級的領導層但其基礎仍然是工人階級的，尤其是來自與工會方面的。

令人感到困惑的是，社會主義工人黨現在仍然支持那些處於的仍然在工黨內的社會主義者和左翼應該繼續留在黨內。但

是利茲·戴維斯（LIZ DAVIES），一個曾經一度在社會主義聯盟內與社會主義工人黨進行合作的前工黨左翼成員，在她離開聯盟之前曾經抗議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做法，並在她的辭職信中描述道：「在2002年社會主義工人黨大會的報告中，社會主義工人黨領導人提議『修正主義者』應該留在工黨內部——這些相同的人在2001年邀請我加入時候所說的展望完全不同。」

英國工會領導人們現今徒勞無功地妄圖「重建工黨」將會流產的。一位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利物浦的47位之一的前市議員，曾經提出關於利物浦工黨的看法：「祝那些左派領導人們好運，如果他們希望嘗試重建工黨的，但首先問題是如何找到它。」在關於工黨問題的立場上，社會主義工人黨甚至在工會內最好的那些鬥士們的右翼，例如鐵路、海事和運輸工會（RMT），它的領導層在蘇格蘭甚至實際地脫離了工黨，而在英國的其他地區它也可能這麼做。由於工國委成員在消防員工會（FBU）北愛爾蘭支部的內部決議的推動，消防員工會也採取了相同的決定。這都發生在社會主義工人黨和它的支持者們陷於渾濁的水中而無力自拔的時候。與其清晰的表明立場，並建議脫離親帝國主義、腐敗的前工人政黨——工黨——並開始從新另立政黨的工作，社會主義工人黨只是提出工會政治獻金的「民主化」。

社會主義工人黨今天的觀點類似與十九世紀後期被誤導工人和保守工會領導人的主張，工人階級應該保留作為自由黨的尾部並「重建它」！相同的觀點——「較少邪惡的理論」——也在美國被應用於支持民主黨以對抗布殊。工國委的美國支持者強烈地反對這點——觀點：「這一觀點不僅僅是適用於2004，也適用於2008、2012、甚至有需要的話直到3016。」換而言之，支持「較少的邪惡」的理論是反對工人階級獨立建立自己階級的組織並將他們永久地束縛在資產階級黨派的「外衣」上。

社會主義工人黨等同於幻想的「修正主義」的企圖（毫無疑問這確實存在於工人之中）和新工黨的支持是虛假的。當工人階級遭受著來自老闆和他們政府的種種攻擊，新工黨尋求的是對削減生活水準。當社會主義被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運動正式從工黨的政治備忘錄中移去之時，在過去的修正主義的時代不可避免地會存在廣泛的幻想，例如工人階級的生活水準的不斷的提高。但是這如何等同於新工黨的行為呢？這個政黨事實是作為邪惡的新自由主義的媒介從而尋求進一步地降低生活水準。新工黨、保守黨和現在的自由民主黨之間在接受私有化的問題上僅是在紙面上有程度的區別但實際差別非常小。

就象在以前的歷史時期中的許多自認為馬克思主義者一樣，社會主義工人黨日益採取右翼的機會主義立場而嘗試能迅速獲取重要政治影響力的捷徑。這也不是他們第一次採用類似的手法；在1960年代該組織的「自由階段」時期，他們機會主義地吸納各種短期的和單一問題的運動而沒有嘗試技術性地將這與社會主義的選擇相聯繫。但是他們現在的立場有所不同，他們進一步提升對於運動主要領導人的注意力而不

是激進的基礎群眾——如「尊重」的格拉維、過去的利文斯通、和反戰運動中的重要角色等。

儘管他們在形式上宣稱需要一個「革命黨派」，但在實踐中社會主義工人黨從他們原有的目標上有了迅速的演變。例如蘇格蘭社會主義黨或者法國革命共產主義者聯盟，這意味著從以前立場上發生重要的變化。這會導致他們在未來日益尖銳的社會和經濟危機的基礎上變成更為意識形態化的，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組織架構的有一定規模的甚至群眾性的修正主義，左派修正主義或者甚至是中間派潮流的骨幹力量。也許這不會導致他們完全正式地捨棄他們以前的「理想」，但在實踐中，在未來他們將被歸入時間的薄霧之中。今天為了進一步推進一個更為「激進」的廣泛立場，因為他們相信這是唯一能夠接近工人階級人民的道路，他們降低了他們曾經「革命」的語調，有效地邊緣化了他們主要的「社會主義」訊息。

在歷史上曾經有過許多階段社會主義的思想幾乎已經褪色到消失。科學社會主義的共同創始人，弗裡德利·恩格斯評論道，在法國革命結束巴貝夫（BABEUF）被處決之後，他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被限制在巴黎和法國其他城市的「後巷」中。然而，這些思想的灰燼隨著客觀環境的變化和工人階級在法國和其他地區的增長被引燃成小火然後引起了工人階級的滔天怒火。法國工人階級在1830年和1848年的運動中、在不朽的1871巴黎公社中、以及在二十世紀發生的戲劇性革命事件中，親眼目擊了工人階級的力量隨著社會主義思想無情的增長。相同的過程也發生在其他國家雖然歷史性的格局也許有所不同。

工人階級以及與之相伴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天折已經被許多人在許多場合宣稱過，包括正如我們看到的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今天的批評。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在1905-1907年的第一次俄國革命失敗之後所面臨的局面，類似於今天馬克思主義者在1990年代所面臨的局面。列寧的追隨者減少到了可憐的程度，他以及托洛茨基被迫與各種機會主義思想做鬥爭，甚至在布爾什維克領導層內部。列寧也反對各種極左主義思想的表現，例如對不民主的沙皇杜馬議會的抵制——該政策原本在1905-1907年俄國革命失敗之後為大多數布爾什維克成員多採納。

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改良主義

改良主義——將工人階級的鬥爭限制在所謂的「可達成的目標」的綱領，並培育幻想認為社會能夠在一個延長的時期內通過日益增長而轉變——該觀點自馬克思的時代起就被馬克思主義者積極地批判。

在全球化的資本主義時代，隨著殘忍的新自由主義的綱領對工人階級的攻擊，這些思想比他們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顯得更為烏托邦般的虛無縹緲。但這並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者不會去捍衛在過去歷史上所獲得的一切或者不應該去爭取任何工人階級生活條件的改善。但我們必須持續地解釋即使勝利

實現的時候，這只是暫時性的——一旦條件「成熟」，左手被給予的會被右手所收回。因此必須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工人階級力量，以在組織內部和社會運轉中貫徹社會主義的轉變。

在1990年代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力量在數量和支持上出現下降。但是民主和自由的社會主義的生存力，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所指出的，即使在力量相對孤立的階段仍然能保持其有效性。因此在工人階級具有政治覺悟和合適的條件下事件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的崩潰最終必然會創造變化。它能夠並將這些思想帶回到政治備忘錄內。事實上正如早先解釋過的，整個過程已經在途中，並以極其迅猛的速度發展可能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結束之前就會有結果出現。當在為社會主義進行鬥爭的時候，工國委也緊密地介入為勞動人民的日常生活而鬥爭。

不象那些只準備站在一邊進行評論的人或組織，工國委從未猶豫過介入工人階級的日常鬥爭。因此我們在一系列國家有所成就。我們的英國支部，正如以前提及的在很多領域都是先鋒，現在擁有英格蘭和威爾士內所有比工黨相左的黨派中最成功的選舉記錄。除此之外，社會主義黨比英國任何一個左翼流派有更多的成員活躍於工會的全國委員會和基層之中。

同時，我們從來沒有隱藏我們自己的思想和綱領，我們公開宣稱我們自己社會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更重要的是，我們在某種意義上表達了馬克思主義思想能夠被許多發達地區的男女工人們所掌握。總之，這是為什麼工國委能夠集中那些最好的工人階級的鬥士在它的隊伍中，儘管相對於要完成的任務仍然顯的太少。

國際社會主義趨勢，以英國的社會主義工人黨為例，通常對於國際性工人運動保有懷疑。在英國的每一個主要罷工——如最近的消防員爭論，地方政府工人罷工，以及在希斯羅機場的鬥爭等——當社會主義黨的成員走到糾察線的時候，他們不斷地面對提問：「你們不是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成員吧？」只有當這些工人確信我們不是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成員，我們的同志才能讓他們聽我們說話！在過去社會主義工人黨對於左翼領導人的態度是極端貶損的。他們被社會主義工人黨以極其極端的宗派主義情緒公然譴責為「叛賣者」。當然，這是在1990年代克里夫期間「緩慢回到1930年代」。由於他誇張的說法導致社會主義工人黨可笑地宣稱如果他們在1992年10月21日的礦工示威遊行中有15000名成員和30000名支持者——大約10萬人參與了那次遊行——社會主義工人黨能夠領導一場向議會的進軍，然後保守黨的議員們將不敢支持邁克爾·夏舜霆（MICHAEL HESELTINE）的關閉計畫，並使馬卓安政府崩潰！²⁵

正如我們在此稍後看到的，這次衝突和1990年代的現實狀況導致社會主義工人黨進行180度的大轉變，它自己的領導人在新發現的「聯合左翼」的需要下完全接受了左翼的領導角色。這涉及到對「停止戰爭聯盟」激進的左翼人物和它們最

新的陣線「尊重」政治上的臣服。他們在工會選舉中也做了相同的事情。例如在全國教師工會（NUT），社會主義工人黨與非社會主義的為民主鬥爭工會而進行的運動（CDFU）一起阻礙反對唯一真正的左翼候選人，馬丁·鮑威爾-戴維斯（MARTIN POWELL-DAVIES）。社會主義工人黨在政策上曲曲折折的變化不可避免地在他們隊伍內部產生衝突，從而使他們的成員一直持續流動變得惡化——這也成為該組織的一個特徵，這可會導致大規模分裂。

正如他們開始右傾的變化，社會主義工人黨也開始向「第四國際」的方向移動。他們宣稱「革命左派…包含那些在1980年代失敗以來努力生存下來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在國際範圍內最重要的,國際社會主義趨勢和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²⁶。依靠這種手法上的變化，國際社會主義趨勢希望能排除工國委—將它和它在一些關鍵國家內遠比國際社會主義趨勢規模大得多的力量從世界政治局勢中排除出去。而且國際社會主義趨勢大體上包含了大量激進的小資產階級，尤其是英國國內的。在這個時候工國委的社會主義黨在數量上少於社會主義工人黨（雖然在1980年代並不是如此）。然而社會主義黨在工人階級的各組織內有更為重要的位置，並對於工人階級和勞工運動的政治覺悟有更大的影響。

「莫雷諾主義」傾向

其他的托洛茨基主義流派最初也不能夠適應1990年代形勢的變化。

他們其中的一些仍對工人運動中具有重要的影響的，是主要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的「莫雷諾主義（MORENOITE）」傳統殘餘。托尼·索努瓦（TONY SAUNOIS）曾經拜訪過這組織很多次，並總結了工國委關於該組織的觀點：「來源於莫雷諾主義傳統的力量，主要是國際工人聯盟（LIT）和從他們國際中分裂出來的國際工人聯合（UIT），在他們的組織內擁有英雄般的工人和年青人。不幸地是他們在關於現階段特徵的分析上犯了一系列的錯誤。他們不去面對發生了變化的客觀狀況事實，尤其是在史達林主義崩潰之後。他們中的一些人僅是重複著來自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引句和口號，而沒有真正面對客觀現實世界或者工人運動現在的任務。這尤其表現在史達林主義崩潰期間。基於他們自己的文章《1990年的論題》，他們首先將1989-1990發生的事件看作持續的革命浪潮的一部分！在整個時期他們拒絕承認在蘇聯和東歐發生的一切的本質和對此產生的國際反響。

「直到1996年他們最終承認俄羅斯是資本主義國家。甚至在1995年他們堅持說『通過群眾性的革命運動而使官僚主義的崩潰是一高度積極的發展因為他摧毀了史達林主義的機制。』²⁷同年，他們在巴西的政黨，聯合社會主義工人黨（PSTU），簡單地將其稱為『世界史達林主義機制的崩潰是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的一個戰略性勝利。』」

部分由於與工國委討論的關係，從國際工人聯盟（LIT）中分裂出來的國際工人聯合（UIT）比前者更早接受這是資本主義

復辟的思想。但是不幸地是該集團的一個支部在對應這一狀況時採用了更為機會主義的方式。正如在蘇格蘭的前工國委成員，他們現在傾向於建立更為廣泛的社會主義組織以取代建立一個獨立革命黨派。

大多數國際工人聯合成員拒絕了這一路線，在巴西的一位著名的國會議員巴巴（BABA），與其他三名國會議員被盧拉從工人黨（PT）中開除出來，因為他們反對政府對於工人階級進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攻擊，如在養老金問題上的改革。國際工人聯合巴西支部在建立一個新工人黨社會主義與自由黨（PSOL）中扮演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從而能為巴西的工人階級開闢一個新的未來。

另一個組織是馬克思主義國際委員會（CMI），也被稱為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是在1990年早期從工國委中分離出來的活士-格蘭特（WOODS-GRANT）的小團體。我們將在其他地方探討他們的思想 and 他們日益增長的機會主義。²⁸

國際政黨還是「郵箱」？

對於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言，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是否必須建立革命黨派，而且這些黨派的特徵是否是工人階級所需要的在鬥爭中推翻資本主義而建立一個社會主義世界。

這個星球已經被一小撮殘忍的資本家所控制。他們的政府被重現的美帝國主義所領導，而美帝國主義威脅著人類甚至這個星球的存在。英國的星期日報紙《觀察家》披露了一份五角大樓秘密檔的內容，該檔提出了大規模的環境破壞的警告。它描述道，如果對環境的破壞不加阻止的話，氣候變化將導致在英國從2004年起的未來20年內出現「西伯利亞式的冬天」。

伊拉克戰爭顯示了資產階級的「領導」部分——尤其是美國和英國，但也為包含義大利和西班牙內的其他國家所支持——為了獲取能源而無所不為，尤其是中東第二大產油國的石油資源。所謂的伊拉克的「解放」實質上是一場殘忍的佔領，並且正向其產生反作用，這無法削弱我們關於在現代時期對於武斷的、殘忍的帝國主義行為方式，尤其是美帝國主義的分析。美國如果以它現在所支出的為標準很快花在軍事裝備上所謂的「防衛」費用差不多等於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在這方面投入的總和。這一行為實質是無視大眾貧困和在世界一重要地區的生活狀況正變糟，而且可以預見只要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仍然繼續維持，這會變得更糟。

不僅存在於國內而且在國際範圍內資本的集權化以及資產階級政府間合作以反對工人階級的需求——尤其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執行——所有這些都迫使工人階級去組織相對應的措施。然而如果它們僅僅是早期未成形的，限制在某一「運動」中，他們最終會被擊敗的。大規模的反資本主義，反戰運動動搖了世界範圍內資產階級的統治圈和它們的基礎。但是即使運動光輝如斯，沒有組織將沒有能力阻止戰爭驅動，

更不用說推翻中央集權的資本。這已經很清晰地被參與這些運動中的年青人和工人中的重要階層所掌握。因此建立一個政黨和一個國際的思想能夠在這一階段迅速增長起來。問題是：哪種類型的政黨？而且馬克思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在這樣的發展中起到怎樣一個角色？

當這一切同時發生，蘇格蘭社會主義黨的領導人們清晰地規劃出建立一個更廣泛的政黨的需要。但是與此相伴的是以前他們曾經所屬於的革命的核心理念變得不再是必須的。機會主義——對改良主義的採納，尤其是一個非革命的階段非革命的思想——從不公開宣稱對馬克思主義或者托洛茨基主義的背棄。伯恩斯坦在改良主義的方向上修正了馬克思主義但仍然堅稱他捍衛了馬克思主義。因此，我們在蘇格蘭的前同志仍然宣稱維繫著他們「革命的信心」，但是在實踐中他們追尋著改良主義的備忘錄。

我們指出了他們不可避免地會在民族問題上，和尤其是在建立一個革命組織的需要上機會主義地修正他們的綱領。我們的預言在一個比我們所能正視的短的多的歷史時間範圍內被證實。正如我們所看的，來自於蘇格蘭社會主義黨內部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ISM）的領導人提議應該擊敗這種趨勢。但是即使在國際社會主義趨勢他們的組織內部都遭到抵制，從而大大延緩了這一趨勢。而且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僅僅是蘇格蘭社會主義黨領導層中相對比較鬆散的一個組織。它幾乎沒做什麼以阻止領導層機會主義傾向而滑向更為民族主義（支持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蘇格蘭獨立）或者一個「社會歐洲」的立場。與之相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反而僅僅是支持了這一過程。

類似的狀況也存在於「第四國際」中——尤其是在它法國最大的支部中，革命共產主義者聯盟（LCR）。革命共產主義者聯盟公開地描述它不再是一個革命組織而類似於一個左翼的社會民主組織，雖然仍然包含有「革命派別」。所有的這些都是為了追尋廉價的支持率和選舉勝利。這些機會主義政策與最奇特脫離於基於民主集中制的革命組織的組織結構相混合。現在極端鬆散的內部組織形式流行於革命共產主義者聯盟內。

在國際平面上，有在同樣鬆散的組織觀念。「第四國際」世界大會的檔《第四國際在2003年新調整的角色和任務》中描述道：「國際委員會（IC，前「第四國際」的國際執行委員會）必須在與對立面進行的辯論中扮演它在中心地位的角色。爭論將是完全更為自由的，因為這一狀態將使國家支部變得更加自治而不再需要執行由國際執委會多數所執行的立場。這甚至將在國際執委會內為外部組織參與我們的討論提供更公開的機會，而不必要對我們盡任何組織義務。」換而言之，這個國際組織僅僅是一個討論俱樂部，而參與者沒有任何組織義務去執行通過辯論達成的政策。這與列寧所描述蛻化的第二國際有什麼不同嗎？只不過是一個「郵箱」，而且還是並不那麼有效的那種。「第四國際」現在與其說是一個為動員年青人和工人中的先進階層和通過他們動員整個工人階級的國際中心，還不如說是一個進行國際檔交換的組織。

一個真正民主的革命的國際組織並不會在國際範圍內以一種由上而下的官僚主義形式而達成「決定」。然而不幸地是「第四國際」在過去就是這麼做的，正如其他那些在「托洛茨基主義」寬廣的旗幟下的國際組織。英國的謝利·賀利（GERRY HEALY）和工人革命黨是這樣的，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前領導人詹姆士·卡倫（JAMES CANNON）和約瑟夫·漢森（JOSEPH HANSEN）也是用這種方式。

在這些案例中，當領導人無法說服他們「國際」的不同支部的時候，他們通常沒有進行適當的討論和辯論下採取紀律措施。這是與在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之下的第三國際（CI，共產主義國際）早期活動相反的方式。第三國際內有大量的群眾性黨派，例如在法國的案例，在任何國家支部有義務執行任何決定前都會在相當長的階段內先進行對話和討論。例如，托洛茨基曾經代表共產國際在「聯合陣線」的問題上與法國共產黨（PCF）進行了幾乎長達二年的討論，而PCF最初拒絕接受這一決定的。只有經過相當多的辯論並且得到了共產國際內的多數支援之後，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會然後才強制法共執行它的決定。如果不這麼所的話，將把共產國際從一個工人階級的戰鬥的國際組織降格成為一個討論俱樂部。

任何組織或黨派都有義務與革命黨派的名字相符合。沒有無責任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責任。進行充分的討論和辯論並且根據多數的達成決定是必需的，但是決定達成後必須根據紀律來執行。這對於一個革命黨派應該是不言自明的，但是這不適用與今天的「第四國際」。在一個比較寬廣的聯邦式樣的過渡性的組織內，採取如此嚴厲的紀律是不適當的。但是對於一個宣稱站在馬克思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旗幟下的組織，無固定組織形式的組織挫敗了建立一支能夠與工人階級一起推翻資本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的群眾性力量的整個目標。事實是「第四國際」以及蘇格蘭社會主義黨的領導層以極其輕率的方式捨棄了過去所擁有的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概念而替換為非革命性的類似於社會民主派的組織形式。「第四國際」簡明地描述自己：「在新的國際組織中，第四國際將成為眾多思想潮流中的一員。它絕對會保持連貫性。但新的特徵將主要建立在新的綱領的基礎上，而這一新綱領是建立於新的社會和意識形態概念之上的更新。」²⁹

對於「第四國際」而言，「第四國際」的名稱並不代表其他的托洛茨基主義流派，包括繼續跟從托洛茨基的群眾革命性國際概念的工國委。在所有「第四國際」的書面材料和它的領導人中，人們可以發現對於政治機會主義的批評，例如澳大利亞的前托洛茨基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黨（DSP），和其他仍然聲稱在托洛茨基主義的旗幟下的組織。但是「第四國際」自身的所犯下的同等問題就不是問題。歷史地看，馬克思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不得不與宗派主義和極左主義鬥爭，也包括反對機會主義、改良主義、中央集權主義和其他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脫離的意識形態。但是今天「第四國際」仍然宣稱：「我們堅信通過與其他激進的非宗派主義的思想潮流所合作，特別是新的黨派和新的國際組織吸引的新力量。」³⁰

巴西的階級調和主義

這一路線所會導致的，在「第四國際」巴西支部的領導人物對待盧拉政府階級調和主義中暴露出來。

針對盧拉迅速地右傾化，他們得出正確的結論，革命共產主義者聯盟的領導成員弗朗索瓦·沙比特（FRANCOIS SABIDEL）寫道³¹：「巴西工人黨的領導層，曾經在過去的數年裡宣稱要進行階級鬥爭與新自由主義進行鬥爭，但今天在金融市場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要求下正在執行著新自由主義政策。」對於義大利的重建共產黨（RC）也得出了相同的觀點：「另一個例子是法士多·貝提諾堤（FAUSTO BERTINOTTI）和義大利重建共產黨領導層的轉變，他們正在討論與中左力量進行合作的可能性，即與『橄欖樹』（OLIVE TREE）力量和新自由主義的歐洲委員會主席羅馬諾·普羅迪（ROMANO PRODI）進行合作。」^{（出處同上）}由於這些路線的出現，實際上重建共產黨已經同意與「橄欖樹」的資產階級的政治力量達成正式的協定。

關於巴西的案例，由於盧拉政府迄今為止的右傾化，所以在巴西的左翼人士中有一個關於盧拉政府將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分手的笑話：「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太過左傾了！」正如工工委的巴西支部所指出的，盧拉政府同時對教師和公務員的利益進行攻擊——導致在2003年6月全巴西內發生的達30000人的遊行示威。在2004年從業人員的生活水準有所降低，真實收入據預期下降了15%。巴西群眾最主要的失望之一在於土地問題。到2003年底只有13000戶家庭的土地問題被解決了，遠低於盧拉曾經許諾的解決60000戶家庭土地問題。而盧拉政府的土地發展部長米格爾·羅瑟多（MIGUEL ROSSETTO）恰恰就是「第四國際」的巴西支部——民主社會主義黨（DS）——的成員，當其他「第四國際」支部的成員被從工人黨開除出去的時候，他正在主持這一政治上的退卻！在被開除的人員中最卓越的是海勒莎·海倫娜（HELOISA HELENA），她負責組建了一個新的黨派，社會主義與自由黨（PSOL）。這發生在當民主社會主義黨仍然留在工人黨內作為其一個支派，如前所述的在政府內保留著土地發展部長的位置，並在經濟部內還有政治顧問。甚至民主社會主義黨內的「左翼」也遏制他們在工人黨內的要求，僅從經濟部裡撤走了那些顧問但沒有號召辭去土地發展部長的職位。這現在已經被民主社會主義黨內的成為大多數的右翼所挫敗。所有這些都被「第四國際」有效地忽略了，他們預備了進行一場「爭論」但沒有對它的巴西成員進行尖銳批評，事實很明顯它的巴西成員通過服務於資產階級政府而背叛了巴西群眾的利益。如同所有托洛茨基主義者知道的，「第四國際」巴西支部的行為與在1930年代導致西班牙革命脫軌中扮演致命角色的西班牙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有什麼不同呢？但是，「第四國際」的錯誤是因為支援一個非「左翼的」政府，就象在1936年的西班牙在某一階段名義上存在一個左派政府，但事實上「第四國際」支持的是一個公然宣佈執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前左翼黨派，現在它所維持的巴西政府也是一個右翼政府。但是因為盧拉不能容忍在工人黨內部存

在任何反對派，所以海倫娜與其他三個議員——巴巴·約奧·馮提斯（JOAO FONTES）和露西安娜·根羅（LUCIANA GENRO）一起在社會主義革命黨（工工委巴西支部）的支持下推動建立新的政黨的運動。

針對義大利的重建共產黨（PRC）「第四國際」維持著相同的外交沉默。一方面，正如近來2003年夏天他們的世界大會上，「第四國際」宣稱歡迎「由重建共產黨和蘇格蘭社會主義黨之類組織所帶來的突破性的進展」。³²在義大利重建共產黨問題上，當其成立的時候，毫無疑問它體現了一個重要性的突破，但那是在1991年！它沒有實現義大利工人階級中那些因為政治上的蛻化而機會主義的領導層而積極反對前共產黨（DS）成員的根本希望。重建共產黨曲折前行從左傾變得不再那麼左傾，而且在過去的十年中黨內「第四國際」的成員在領導層中形成了自己的派別。現在貝提諾堤通過與「橄欖樹」的聯盟而向右派開放組織，在重建共產黨的內部「第四國際」短暫性地表現出了反對。但這是最混亂和最無倫次的方式表現出來的。例如，自從2003年6月底起他們說道，「這裡存在著開放性……在與重建共產黨和現在與『橄欖樹』之間存在問題的新聯繫，反映出一個由衝突和社會對抗的真相所呈現內容的主題選擇性。這不僅是兩個主體間的主題關係，而是在幾個夥伴之間的關係，所以對各種運動都是採取開放的形式並由這些運動自己來決定選擇。」³³

你想怎麼做就怎麼做！但是「第四國際」什麼也沒做來協助重建共產黨的成員應對貝提諾堤可能的右傾行動，尤其是針對那些並不活躍的重建共產黨支持者們。與之相反他們的表現象貝提諾堤的支持者一樣，當重建共產黨右傾轉向「橄欖樹」時而被震驚。由於義大利存在的政治真空，即使出現了右傾化的動向，重建共產黨仍然可能獲取選舉支持。然而當並不活躍的群眾給予重建共產黨支持的同時，那些曾對它充滿期望的活躍的工人們將對此反對或者變得惰性而不活躍，甚至一部分會離它而去；所以即使當它的成員基礎變得衰弱的時候，它的選舉支持率也可能會上升。事實上這裡有一些證據證明這已經並正在發生。這並不意味著重建共產黨的歷史篇章已經結束了，但是隨著它右傾化的演進，對大部分尋找社會主義和革命道路的青年人而言它將不再是具有吸引力的選擇。

即將發生的革命事件

托洛茨基—馬克思主義組織領導層的角色任務是要預見可能發生的事件和追蹤其相關發展，包括調查和瞭解政黨、它們的綱領和它們領導方式的政治弱點。

不可避免的是，除非這些黨派的領導人被有覺悟的階層所控制和被馬克思主義思潮所影響，否則他們可能向右翼滑去。就這一標準而言，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失敗了，只要它繼續維持現有的政治軌跡失敗就不可避免。但這不意味著建立具有革命核心的代表工人階級的群眾性黨派的可能性被排除了。這也絕不意味著新的群眾性的國際組織，正如工工委成立之初所展望的那樣，變得不那麼重要了。恰好與之相反，

當初工國委成立之初的那種政治條件（即如1968-76年代時候發生的一系列革命事件和具有戰鬥力的新一代人的出現）將被這個新世紀最初十年裡即將發生的爆炸性事件所超越。

2000年代最初幾年的形勢正類似於曾經在20世紀最初所發生的情況。在一系列戰爭中最具有災害性的戰爭的是伊拉克戰爭，其中包含著有害的種族主義傾向，經濟混亂和可能的危機。然而其中也含有無法比擬的全世界大多數人口對於物質豐富、生活和平、社會和諧並能充分發展和解放所有人的才能的社會的嚮往。但是這樣的世界不可能在過時的資本主義世界中所實現。或早或晚，以工人階級為首的世界人民中的絕大多數都將清晰地明白這個道理。

但是偉大的社會變革——社會主義的變革將成為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變革——是由勇敢的少數先行者準備的。他們總結出對於這種變化的嚮往應該基於一個明確的政治綱領，一個有覺悟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黨派，和與之相對應的組織。這是工國委在1974年的立場，這一立場在「現代」的今天仍然和在30年前的時候一樣符合形勢需要。

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已經看見「社會主義全球化」萌芽的出現，但這只有通過一個革命的群眾性國際組織才能實現。這絕非是在各種小團體間進行什麼毫無結果的宗派鬥爭。這要求在群眾運動之前先進行一場思想戰，以在意識形態上對工人階級面對的問題提出清晰的答案，並包括由此得來的所有策略和組織上的推論。

參考書目和出處

1. Remarks by Alan Greenspan at the Bundesbank Lecture 2004, Berlin 13 January 2004. From the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Review', March 2004.
2. Karl Marx & Fredrick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3. Ibid. p.52.
4. Bob Woodward, 'The Agenda: Inside the Clinton White House', 1994.
5. International Viewpoint, October 2000.
6. Vercammen, 'The question of the party: Trotsky's weak point', International Viewpoint, October 2000.
7. Michael Lowy, International Viewpoint, October 2000.
8. Ibid.
9. Ibid.
10. See 'Cuba: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 Debates on the Revolution and Cuba Today', CWI Publications, 2000 or visit socialistworld.net
11. Ibid.

12. Karl Debbaut, 'France: Workers on the move', Socialism Today, June 2003. Can also be found at www.socialistworld.net/eng/2003/06/28france.html
13. International Viewpoint, November 2001.
14. 'At the heart of the anti-capitalist combat... Relaunch, opening, regroupment and repositioning' Francois Vercammen International Viewpoint 349 - May 2003
15. Ibid.
16. Ted Grant, The Unbroken Thread, June 1989.
17. Available on www.marxist.net
18. 'Which Way for Socialism?' 2001, available (in German) at www.sozialismus.info
19. First published in 'Sozialismus von unten' ('Socialism from below'), Number 2, November/December 1994.
20. Tony Cliff, Trotsky: The Darker the Night, the Brighter the Star, p. 300.
21. Alex Callinicos, The Anti-Capitalist Movement and the Revolutionary left, March 2001
22.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Journal', Winter, 2002.
23. Ibid.
24. Ibid.
25. 'The SWP and the Crisis of British Capitalism', 1992.
26. Alex Callinicos, The Anti-Capitalist Movement and the Revolutionary left, March 2001.
27. 'For the Re-building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 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LIT and the Workers' International' (published in English), December 1995.
28. See 'Revolutionary Socialists and the Venezuelan Revolution' at www.socialistworld.net and 'Militant's Real History', at www.marxist.net
29. 'At the heart of the anti-capitalist combat... Relaunch, opening, regroupment and repositioning' Francois Vercammen International Viewpoint 349 - May 2003
30. Ibid.
31. 'A New Force', International Viewpoint, February 2004.
32. 'Fourth International: A Congress of Optimism'. 2003.
33. Livio Maitan, International Viewpoint, September 2003.

一個社會主義世界是可能的！

「工國委的任務是幫助創造條件來形成這樣一個國際組織。但是這只有建立在對過去歷史上經驗教訓的學習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尤其是對於以前國際組織失敗的教訓的學習。建立這樣一個群眾性國際組織的重要一步是在各個國家範圍內建立群眾性政黨。直到這樣群眾性的政黨產生，那麼國際性組織的框架才會產生。一個具有生命力的群眾性國際組織的胚胎只有在爆炸性的時期到來時才能夠產生。我們相信工國委能夠在這一過程扮演重要的角色。」

——彼得·塔夫



工人國際委員會
中國、香港及台灣支部 出版

網頁：www.chinaworker.info
電郵：socialist.hk@gmail.com
Facebook：www.facebook.com/socialistaction

捐款戶口：
(恆生 Heng Seng) 788-119204-668
(中銀 Bank of China) 012-932-1-017935-6

